

第三世紀辰王政權與東亞冊封體制

甘懷真*

冊封體制是前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的主要原理。在目前的學說中，其起源與早期變化的問題仍有探討餘地。本文主要目的是藉由第三世紀存在於朝鮮半島的辰王之例，探討漢魏之際冊封體制的演變，也同時觀察冊封體制如何影響我們理解古代東亞的政治秩序。本文以文獻學為方法，採史料批判的立場，以《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為主要史料。本文第一部分討論正史四夷傳的信憑度問題。第二部分以漢代東北亞所謂蠻夷之國為例，探討漢朝將域外政權置於郡縣制下縣級屬國脈絡中的這一史實。第三部分探討第三世紀以後，東北亞出現所謂大國崛起的現象，於是蠻夷屬國不再被置於郡縣制下的縣級，開始發展出「自主的屬國」的制度。第四部分是考證該〈東夷傳〉中〈韓傳〉中的辰王相關紀錄。本文試圖在前人的業績下，重新解讀辰王相關的史實，以加深我們對於古代朝鮮半島南部王權的理解。

關鍵詞：辰王、韓國、冊封體制、東夷、東亞王權、郡縣制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藉由第三世紀存在於朝鮮半島的辰王之例，探討漢魏之際冊封體制的變化。第三世紀前半的東亞政局變動不安。西元220年，中國的政權交替，四百年的漢帝國正式告終，曹魏政權成立。在此同時，中國的週遭，尤其在東北亞地區，建國運動興起，各王權也紛紛形成，本文也稱之大國崛起，如高句麗、新羅、百濟與倭國等，都可溯及第三世紀前半葉的諸變化。本文也希望藉由辰王相關事例，探討東亞諸王權間的互動關係。但由於篇幅與課題之限，本文只能集中在中國王權(漢、魏)與以辰王為代表的朝鮮半島南部王權的關係上。再藉相關史實的考證以再論漢魏之際冊封體制的轉變問題。

辰王以及相關的辰國，在今天的韓國史研究中廣為研究者所知。而辰王與辰國的紀錄是在《漢書》、《三國志》等中國正史中，其記載十分簡略，故長期以來，較少為中國史研究者所重視，是一個不熟悉的課題。因此，我先利用一些篇幅，說明辰王相關課題。

若《三國志》等中國正史的記載可信，則辰王是朝鮮半島南部的第一個王權。長期以來，辰王及其相關的辰國紀錄在韓國史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視。在韓國通史中，這段《三國志·魏書·東夷傳·韓傳》中的辰王紀錄也被視為韓國史的一部分，¹而認為辰王是韓國古代(約西元前二世紀至後三世紀)的王權。²但辰國與辰王也一直是難解的問

¹ 為求行文簡潔，以下《三國志》的篇名採略稱。《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略稱《三國志·東夷傳》，《三國志·魏書·東夷傳·韓傳》則略稱《三國志·韓傳》。

² 試舉一例，作為韓國教科書的《韓國の歴史》(日譯本)一書這樣寫道：「在

題，聚訟紛紜。主要的問題在於辰王與辰國的史料只存在於《漢書》、《三國志》與《魏略》等少數幾本史書中。其記載十分簡略，而中國正史外夷傳的信憑度也被懷疑。

辰王問題是解明古代朝鮮半島王權狀態的關鍵。若欲重探此課題，只有訴諸文獻學的立場，而採史料批判的方法。本文也在這個方法與立場上，重新考證辰王相關問題。關於辰王課題，如何運用文獻學與史料批判，我扼要說明如下。

首先，本文強調文獻學是因為辰王課題無法藉考古學而有新發展。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學對於歷史學研究有重大貢獻，此無庸贅言。所謂「雙重證據法」更是被稱頌的典範。因此歷史學家在遇到研究瓶頸時，就寄望於新出土史料。近年來，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因有大量的新出土史料而獲致重大進展。成果有目共睹。在韓國古代史方面，因為文獻史料的缺乏，更是寄望於考古文物，考古學所扮演的角色更明顯。的確，目前我們對於朝鮮半島的古代歷史的知識，許多是奠基於考古學。³

今天的史學研究應參照考古材料，包括古文書、民俗紀錄等，已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是，我們也不應期待新出土文物可以成為史學難題的救星。許多研究課題仍可藉由傳統文獻的解讀而得以開展。對於中國史研究尤其如此，因為中國史研究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官方文書，包括正史。就辰王課題而言，它的時代是第

漢江以南地域，辰很早就成長……因之馬韓、辰韓、弁韓的連盟體出現。三韓中，……馬韓之小國目支國的支配者被推戴為馬韓王與辰王，而為三韓全體的指導勢力。」(節譯)參見大槻健等譯，《韓國の歴史》，頁48。

³ 如我們藉古代朝鮮墳墓的探究而認識當地的政治組織狀態，甚至可以糾正史書記載的偏差。其中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是結合考古學與文獻學的傑出著作。吉井秀夫近作綜合整理並提出系統的學說，見氏著，《古代朝鮮墳墓にみる国家形成》，尤其是頁243-244。

三世紀前期。此時朝鮮半島南部並不使用漢字。非文字紀錄的考古證據能告訴我們當時政治的一般狀態，如地域社會的首長制的形態，但不能顯現特定政權、制度或事件。期待新出土文物中會有辰王紀錄的直接史料，若不是幻想，恐怕是一種奢望。

其次，對於古代王權研究，正史等傳統文獻仍是主要的史料來源，應受相當的重視。整體而言，這類文獻資料相較於考古文物，仍提供了更多的資訊。其實這類傳統文獻，對於研究者而言並不陌生，不需提示，且多數在今天都可以在網路上全文檢索。只是在利用這類史料時，可以有二種態度。一是重新檢討史料的信憑度。即使不需一味疑古，也不可一味信古，對於所使用的史料須作出批判。二是重視這類文獻的脈絡性，從脈絡中探索史實。這是史學方法的老生常談，無甚新意。我只是再強調如正史一類的傳統文獻，雖可以視為史料彙編，其實是著作。故這些文獻是有作者，有文體，有著作目的。而現今的一些研究，雖站在史料實證的立場上，但只是徵引諸來源史料，而加以排比，以為如此即可以拼湊出事實的樣貌。古代史研究都有史料稀少的困境，故研究者也只能用幾條史料以論證史實。這是學科性質所致，無可厚非。但更因此要防止斷章取義之弊。其方法是針對關鍵性的史料出處，探討該著作的整體性脈絡，再藉以理解所徵引史料的意義。

具體就辰王的課題而言，其關鍵史料是在《三國志·東夷傳》。對於研究古代東北亞，這是現存最早專題記錄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歷史的文獻，故是有名的文獻。但近代以來，作為中國正史外夷傳，其信憑度也受質疑。本文的第一部分就是重新檢討《三國志·東夷傳》作為史料的信憑度。其次，本文也將〈東夷傳〉中的辰王相關

記載置於該傳的整體「東夷王者觀」中解析。⁴正確理解陳壽究竟說了什麼，應是這項研究的起點。故本文花了較大的篇幅在解讀陳壽的「東夷王者觀」，以及在這套論述下，他如何陳述辰王與辰國。

以下先概觀諸來源史料，以為本文論資。辰國之說的最早證據是《漢書·朝鮮傳》。該史料是說衛氏朝鮮的朝鮮王右渠時期，約西元前第二世紀時，有一辰國欲藉由衛氏朝鮮以交通漢朝，但不為朝鮮所引介。這條史料可證明在朝鮮附近有一辰國存在。但這段史料的來源顯然是《史記·朝鮮傳》。《史記》中沒有辰國的記載。若對照《漢書》與《史記》，則有學者懷疑辰國之說是傳抄之誤。⁵

其後辰國的記載出現在《三國志·韓傳》。這離《漢書》的寫作時期已隔約二百年。〈韓傳〉在記述「三韓」(馬韓、辰韓、弁韓)時，說辰韓是「古之辰國」。亦即陳壽認為《漢書》所載的辰國就是其後的辰韓之地。但這又是一個具爭議的見解。又超過半個世紀後出版的《後漢書·東夷傳·韓傳》(以下簡稱《後漢書·韓傳》)則一改《三國志》的辰韓為辰國說，主張三韓之地皆為「古之辰國」。這也是中國正史開始主張朝鮮半島南部之地為辰國。

辰王的史料則首見於《三國志·韓傳》。相對於辰國的不確定性，辰王的存在應是史實。只是相關史料都沒有明言此辰王政權與「古之辰國」有何關係。辰王作為王者，與三韓諸國關係也曖昧難明。反而後出的《後漢書·韓傳》提出了較完整的辰國與辰王學說。范曄連結了「古之辰國」與其後的辰王政權的關係，且主張辰王治理了三韓之地。這看似是一個合理的歷史解釋，且連結了《漢書》所載

⁴ 東夷王者觀的提法，參見井上秀雄，〈『三國志』の東夷王者觀〉，頁192-198。

⁵ 持懷疑論者以三品彰英為代表，參見三品彰英，〈史實と考証——魏志東夷傳の辰国と辰王——〉。

的辰國到曹魏時所存在的辰王政權。但歷史學研究不應以合理的說法與否認定事實。

長期以來，學者根據《漢書》、《三國志》與《後漢書》等中國正史的辰國與辰王紀錄，建構了「辰國——三韓」的歷史發展的學說。扼要而言，自西元前第二世紀開始，朝鮮半島南部出現辰國。其後此區域發展出馬韓、辰韓與弁韓的三韓諸國形態。辰王則是此三韓聯盟的共主王者。近年來的研究雖不再認為辰王是專制君主，但仍多主張其為統一政體的首長。⁶辰王政權的衰壞則是因為第二世紀後期以來，中國王權的強力介入此區域的政治。⁷

這樣的歷史像看似有史料根據，且來自中國正史，也滿足了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歷史學的國族想像。辰王之說可以用來證明朝鮮半島南部自古以來即存在著自生、自主的王權，並具有統一國家的本質。這種民族主義史觀的對錯不是本文的關懷，我們還是回到史料批判的立場，只要史料考證上不能成立者，其歷史像都應修正。⁸

既然一切的辯論都在《三國志·東夷傳》，我們就重回史料的現場。本文就從該傳的檢討開始。其目的有三：一是探討〈東夷傳〉的信憑度，二是探討陳壽的「東夷王者觀」，三是在〈東夷傳〉的整體脈絡重新解讀辰王相關史料。

就第一點，本文想證明《三國志·東夷傳》的作者陳壽是基於其儒家經典主義的信念與原則撰寫該歷史。所謂經典主義，我是指儒

6 對這種專制君主說作出批判的早期代表性著作，可推栗原朋信，《上古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頁 108-132。

7 李基白著，武田幸男譯，《韓國史新論》，頁 51-52；李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之諸問題》，頁 224-227。

8 對於《三國志·東夷傳》進行史料批判的研究法，可參見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上)〉，頁 13-15。

家經典所載皆為客觀事實的信念，而以此事實作為主觀理解這個世界的根據。⁹陳壽對於所謂東夷的論述是基於當代人從儒家經典而來的概念，而其目的則是補充儒家經典的知識系統。由於這種動機與目的，我們一方面觀察到儒家經學知識體系中的世界像如何引導中國學者觀察域外的蠻夷。¹⁰這個世界像主要是所謂的天下理論。¹¹中國官方或學者以天下理論去理解並詮釋其所處的世界，尤其是自身感觀所不能及的域外領域。我們可以想像誤解是一定會產生的。但一體兩面，因為史學作為經學的一環，也被要求信實，故限制了學者任意造假。

就第二點，本文的主要篇幅將用於考訂《三國志·東夷傳》中的辰王相關史料。其方法之一是藉由東夷傳中對於各政權、族群的記載，分析陳壽所具有的歷史知識體系，尤其是「東夷王者觀」。¹²再將辰王的探討置於此「東夷王者觀」中，以考辯何者為中國方面的想像，何者為在地事實。此即上述的第三點。

總之，若要探討辰王問題，必須重新回到文獻學的方法，並對《三國志·東夷傳》作嚴密的史料批判。在作個別的史實考訂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作者(陳壽)如何整體性的理解與敘述韓國(指朝鮮半島南部複數之國)的歷史，然後在此脈絡中探討《三國志》如何陳述辰王的歷史。多數研究喜歡用諸來源史料間的互證，如以《後漢書·東夷傳》或《晉書·東夷傳》批駁或訂正《三國志·韓傳》。這當然仍是一種

⁹ 甘懷真，〈制禮觀念的探析〉，頁 89-94。

¹⁰ 本文作為學術研究，將歷史中的一些慣用詞彙當成學術用語，只是作為客觀描述，沒有價值判斷。如蠻夷、東夷等。

¹¹ 筆者近年從事東亞歷史中的天下概念研究，近期相關著作則有〈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等文。

¹² 井上秀雄，〈『三國志』の東夷王者觀〉一文已提出類似的研究法。

有用的研究法，但我們需留意多數相關史料是該作者解讀《三國志·韓傳》的結果，與其看成證據，不如視為研究成果。

即使筆者想使用更合理、有效的文獻學研究法去探究辰王課題，但仍受到史料稀少的限制。更何況作為直接證據的史料幾乎是孤證。關於辰王的史料考訂，筆者不敢斷言自己的推論確定無疑，在一些爭議問題上確實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但本文目的則只希望通過論證而能對理解東亞王權形成的整體形像有所助益，尤其是想更好地探究中國週邊王權興起與中國冊封體制之間的複雜關係。

冊封體制是前近代東亞世界國際關係的主要理論。重提這個老課題，是因為近年來漢代郡國制研究有了新發展。既有的冊封體制研究是建立在「郡縣」與「蠻夷屬國」二分的預設上。中國王權(天子、皇帝)在郡縣域內推動郡縣制，而在郡縣域外則實施冊封。冊封是中國天子與域外蠻夷君長建立君臣關係。但新的郡國制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於郡縣制的認識，同時改變了對郡縣邊界的認識。這也將對漢魏冊封體制提供新的研究視野。本文將藉由漢魏之時中國東北邊境的郡政府與其下屬的蠻夷屬國的關係研究，重啟此項課題的討論。

二、作為經學一環的《三國志·東夷傳》

既然要將重點置於《三國志·韓傳》，就必須先辯解《三國志》史料的信憑度。對於《三國志》該史料持懷疑論者，大有人在，這類意見也自須傾聽。¹³另一方面，從戰後以來，利用《三國志·韓傳》

¹³ 在井上秀雄等譯註的中國正史東夷傳注釋《東アジア民族史——正史東夷伝——》中，對於《三國志》的相關史料也多所質疑；又如鳥越憲三郎對於《魏志·倭人傳》的批評，認為多架空之論。參見鳥越憲三郎，《中国正史倭人・倭国全釈》，頁 98-99。

以考訂辰王歷史者，也名家輩出。¹⁴從史料批判的立場，對於史料應以存疑的立場出發，此不待言。任何史料中所載的史實皆有偽造之可能，中國正史外夷傳自不例外。但犯錯與偽造是截然不同的史料性質。若說中國正史外夷傳的記述是為了滿足皇帝制度的世界像的需求，即所謂天下秩序，此言之成理。我們的確要注意正史書寫是有特定立場與觀點。如本節要討論的經典主義也是正史書寫的另一個立場與框架。這些立場、觀點與框架的確會使事實的理解與陳述出現錯誤，所以我們才要作史料批判。天下理論與經典主義的確會誤導古人記錄外國的資訊。但這二個立場是否會引導官方紀錄去偽造域外歷史，則可以再深究。

《三國志·東夷傳》有一段前言，清楚反映了中國古代正史對於記錄所謂外夷的立場。其文曰：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¹⁵

這段史料常被引用，但我要特別演繹出其中的經典主義，這一點罕為學者指出。該史料中的「書」是指《尚書》的〈禹貢〉。陳壽先以〈禹貢〉的「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定義人所居住的空間範疇。而這個範疇內的「九服」，則是可以透過經典而有所認識，所謂「得而言」。但九服以外，或文中所謂「荒域之外」，則在經典中尚屬未知的世界。這個未知世界之事須藉「重譯」才能得知，故困難。只有

¹⁴ 日本學者基於東北亞史研究的興起，在上世紀初就注意到辰王問題。可舉者如那珂通世，〈三韓考〉；白鳥庫吉，〈漢の朝鮮四郡疆域考〉；末松保和，〈真番郡治考〉。

¹⁵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0-841。

使節等「足跡車軌」所至，中國才能知道該國的文化。這些國家雖是夷狄之邦，但仍有禮儀的現象。「禮失求諸野」(《漢書·藝文書》引孔子之言)的確是真實存在的現象。因此本書接續撰述這些東夷之國，列出其歷史文化的異同，以接續前史如《史記》、《漢書》所未備者。

細繹這段話，可以感受到陳壽在辯護東夷傳的正當性。¹⁶他有必要說明為什麼要為經典所不載的地區立傳，且這些地區可能是非文明與充滿奇風異俗。《三國志·東夷傳》所載的諸國、諸族既在「九服」之外，且是過去儒家經典中所不載的。該段話的字裡行間所透露的焦慮或許是今人難以體會的。對於現代學術而言，史學是科學的一環，探索未知世界是乃理所當然。但對於陳壽而言，史學是經學的一支。在儒家經典主義的壓力下，學問是用來詮釋、補充或印證經典所說的，而非探究新領域。

陳壽顯然遇到了困境。一方面他必須服膺儒家經典主義，且史家不應記述不雅馴的事實。另一方面，由於東北亞局勢的劇烈變化，且因中國介入，故當地的政情、歷史與地理知識傳入中國官方。上引《三國志·東夷傳》的序言中，筆者略去未引用的部分，是陳壽記錄漢末以來中國王權介入東北亞。魏朝廷派兵討伐高句麗，因此進入極遠之地，一直到東邊大海，當即西伯利亞的太平洋岸。¹⁷中國官方也藉此得知了今天中國東北的資訊。作為史家，不能裝無知而不報導。問題在於〈東夷傳〉中記錄的外族皆無明確的經典根據。

陳壽的策略是將東夷的史實納入經學的架構中。上引《三國志·東夷傳》一開始所說的「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意指海與流沙之間的區域是經學所對應的空間範疇。言外之義是東夷在此

¹⁶ 井上秀雄在解讀《魏志·東夷傳》時已指出其「不安」。參見氏著，〈『三國志』の東夷王者觀〉，頁198。

¹⁷ 《三國志·東夷傳》，卷30，頁840。

範疇內，故記載東夷從經學的標準而言，亦具合理性與必要性。而在既有的經書中，東夷之所以不被記錄，是因為經書只描述「九服」之內。但陳壽強調，東夷之所以缺乏紀錄，只是其資訊難以取得。

其次，陳壽針對東夷為野蠻之人、東夷紀錄荒誕且不符合經學的體例的質疑提出辯解。陳壽表示東夷人亦有其禮，甚至是中國式的禮，如同中國的美好古代曾有過的。換言之，對於東夷的記述是可以合乎儒家經典主義的規範。

《三國志·東夷傳》的這段序言反映出作為經學的史學有二面性。一是對經學的信仰，二是對客觀真實性的信念。經學構成了史學家的世界觀與分析概念。我們可以說中國正史外夷傳是以一個特定的立場觀察與說明域外的政治、文化，而將這些史實納入經學的框架中。因受經學的規範，被觀察、記述的史實遭誤解、扭曲是有可能的。然而，一體的兩面，經學也規範了學者任意去創造新的知識，或者去發明新奇知識以博取名聲。雖然這不保證正史中的史實都是正確的，此無庸贅言，但正史對於域外的描述決不會是中國王權的想像而已。

所謂儒家的經典主義的世界觀可用天下一詞表現。這套古代的天下觀是用以描述中國天子(王者、皇帝)所治理的區域及其型態。其理念若用一句話表現則是「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依據此理念，天子一方面是「治天下」，另一方面天子所實際統治的區域是封閉與內向性的。所謂封閉，是指天子實際治理的區域是郡縣，而不及於郡縣以外的區域。而所謂內向性，是指中國王權原則上不介入與干預域外政權。目前盛行的朝貢與冊封理論正說明這一點。這樣的天下理論反映在知識領域，則是不鼓勵學者探索天子所統治的域外的地區。一些史家預設中國皇帝制度是外向型王權，故會去編造或杜撰域外的歷史文化，以顯示中國對於域外的控制力。或許這種想法

是基於近代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經驗而來。至少從《三國志·東夷傳》來看，這是不能成立的推想。我們在考量正史外夷傳的史料信憑度時，這是必須納入考量。

然而，所謂內向性是儒家經典主義的規範，不必然是政治現實。歷史上的區域霸權壓迫週遭地區，似乎也是定律，中國自不例外。毋丘儉率軍深入至今天俄國所領太平洋岸，是不折不扣的領土擴張。第三世紀曹魏政權成立後，一方面中國王權進一步儒教化，儒家經典更成為政治原理。另一方面中國在東北亞爭奪土地、人口的爭戰更頻繁。而這二者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以《三國志·東夷傳》為例，中國的東北亞侵略使得這個區域的歷史、文化資訊開始為中國官方所知。可是這個區域卻是儒家的五服、九服與九州學說都略去不論者。陳壽基於史學信實的原則，沒有道理不記錄這些東北亞新史實。可是這些紀錄在乍看之下又踰越了經學知識的框架。一些正史四夷傳的研究者認為，記載外夷是要炫耀王朝的對外經略，筆者不能一概否定。但至少就《漢書》、《三國志》與《後漢書》這三本正史的外夷論述，我們反而看到作者需要引用儒家經典以合理化這些紀錄，並用以證明不得不然的用意。

《漢書》有〈匈奴傳〉，這當是繼承了《史記》的題材。但不同於《史記》，《漢書》辯護了〈匈奴傳〉的正當性。班固在〈敘傳〉中的匈奴條曰：「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¹⁸他引用《尚書·舜典》中的「蠻夷猾夏」之語，證明「蠻夷」亦是經學記錄的對象。又周宣王討伐蠻夷之事，亦收錄於《詩經》之中。在詩經學的傳統中，這些詩如〈江漢〉、〈常武〉、〈出車〉、〈采芣〉、〈六月〉等。據此推論，《漢書》記述漢匈關係與匈奴的歷史，也是

¹⁸ 《漢書·敘傳》，卷100下，頁4267。

合乎經學規範。

《漢書》亦記載朝鮮，《漢書·地理志》之〈燕地〉條曰：

般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¹⁹

這是一段有名的朝鮮論述，其中的諸事件與現象是否真確，另當別論，但班固的用意在以箕子傳說論證朝鮮亦是文明之地，故可為郡縣（樂浪、玄菟等）。對班固而言，箕子去朝鮮的說法有《史記》的根據，見《史記·宋微子世家》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箕子去朝鮮可能是事實，問題是朝鮮究竟在何處？將平壤附近命名為朝鮮，恐怕是依經學的世界像及中國王權支配需求而來的。無論如何，班固是在論證朝鮮半島的北邊雖然曾是中國域外，但因箕子教化而成為文明之區，故可為郡縣。我們也注意這段話出現東夷，而指的是朝鮮，後為漢朝的樂浪郡、玄菟郡。到《三國志》，朝鮮已不在東夷之列。我們看出因中國王權對外關係的變化，東夷也換了人作。

《三國志》的〈東夷傳〉已經在前面討論，故略去。《後漢書·東夷傳》也有一個較長的序言，可供討論。繼《三國志》之後，范曄亦為所謂東夷列傳。且相較於《三國志》，《後漢書》的東夷論述具全面與條理性。這也是一史學史上的「層累造成」。由於中國持續介入東北亞的政局之後，更認識了東北亞的歷史與文化。這些知識也衝擊了既有的天下理論。主要的矛盾在於這些東北亞外族歷來不在中國王權的支配下，又不是所謂野蠻人。如前所述，天下理論最重要說法是「天子治天下」。但在現實上，中國天子並沒統治當時人所認

¹⁹ 《漢書·地理志》，卷 28 下，1658。

識的全人間。因此，天下理論以另兩個學說來解決這個矛盾：一，域外(郡縣之外)的政權向中國天子朝貢或受冊封；二，域外(或所謂九服之外)之人被想像為野蠻人甚至非人，故天子不需要支配此類之人。為了解決東北亞知識所帶來的天下理論的危機，其方法就是將這些新的事實納入經學的脈絡中。《後漢書·東夷傳》就是作這樣的努力。

從陳壽的《三國志》開始，就以東夷的概念定義東北亞外族，如夫餘、韓、倭等。其實陳壽是運用了一個經學論述，巧妙地將東北亞外族包含進東夷的範疇內。古代文獻中的夷與東夷究竟何指，一直是歷史學的辯論。從 1920 年代起，學者就對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感到興趣。1933 年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是一代表作。學者多能認識到古代文獻中所謂的夷是華東地區的人群，主要如淮夷一類。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的民族研究倡議所謂「多元一體」，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各有起源，而不是完全由中原的核心區而來。因此主張東夷是華東地區的土著族群的研究大量出現，這也是今天東夷研究的主流。²⁰

關於東夷的經典說法有「九種」之說。東夷有九種之說源於經典中的「九夷」之說。《偽古文尚書》中的〈旅獒〉有「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的記載。²¹類似的記載亦見於《國語·魯語下》孔丘論楮矢條，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²²周武王時是否有所謂九夷，非本文所能議論，但可推論漢代人認為經典中有九夷之說。在《爾雅》中，更理論化四夷之論，而有「九夷、八狄、七戎、

20 逢振鐸，〈十年來東九夷文化研究概況〉一文探討 1980 年代的「東夷文化熱」。又如逢振鐸，《東夷文化研究》，該書即主張從遠古以來在山東半島有一古文化與古族，即東夷。

21 《尚書》，〈周書·旅獒〉，頁 21。

22 《國語》，〈魯語下〉，頁 215。

六蠻」之說。²³約同時成立的《禮記·明堂位》也將九夷配東方，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更為人知的是《論語·子罕》的「子欲居九夷。」《後漢書·東夷傳》之序也記載了東夷有九種的說法，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注引《竹書紀年》的九夷之說。范曄的九夷說所據為何無可考。但既然《竹書紀年》有同樣說法，可以證明此九夷說是流行之說。

《三國志·東夷傳》記載了夫餘、高句麗、東沃沮、挹婁、濊、韓與倭等七個人群單位，而韓又說有「三種」，即馬韓、辰韓與弁韓。若以種而言，則〈東夷傳〉記述了九種東夷。這應該是陳壽刻意要符合東夷有九種的經典之說。否則，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陳壽會記載此「九種」。如其中有挹婁，而沃沮只載東沃沮，這樣的分類都令人費解。可能的解釋是刻意的區分九類之夷。²⁴

從作為外族的夷到東夷概念成立的變化細節，另當別論。我們可以先得這樣的一個扼要觀察。至戰國時期，由於天下觀念的形成，出現「內諸夏」與「外夷狄」的學說。原本混雜在所謂華夏之內的「夷狄」，在新的天下觀的世界像中，被秩序化而置於中國的域外四週，故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說。²⁵東夷一詞首先出現在《禮記·曲禮》。時間當在戰國末至漢初。在〈曲禮〉中，此詞與「南蠻、西戎、北狄」並列，只是依方位泛稱九州以外的政權與人群。由於經學傳統是將「天下」視為由近而遠的同心方，且

²³ 《爾雅》，〈釋地〉，頁 121。

²⁴ 由於《三國志》沒有完備的四夷傳，只有在〈魏書〉部分有〈東夷傳〉，我們無從考證陳壽是否運用經典中的四夷概念去論述了南蠻、西戎等，如將蠻也分為六，而戎分為七。

²⁵ 詳細討論參見平勢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華へ——殷周、春秋戦国》。

詳近略遠，「五服」與「九服」是最好的例證，故經學傳統本身就是刻意模糊化域外的歷史、文化。經典中沒有東夷的詳細定義與分析，並非是論述怠惰或疏忽，乃依其原理所決定。

我們應視這種戰國東夷說為新的概念。一來，它是經學的概念，是作為儒家經典主義的世界像的概念；二來，它是一個想像的集體概念以規範當時人對於域外世界的認識，且它不是既有資訊歸納後的結論。總之，經典中的東夷概念是中國王權詮釋域外世界的一個概念，其實是一個想像的集體而已，用來對照內部的中國。

東夷是儒家經典中的詞彙，又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陳壽利用了這個特性，將中國朝廷才開始知道的東北亞外族的知識置於經學的東夷概念之中。一直到西漢前期，若從《史記》的內容考察，中國朝廷對於東北亞人群的認知，除燕地之外，只限於遼東與朝鮮，而朝鮮應指朝鮮半島西北部以平壤為中心之地。儒家經典中的夷或東夷肯定不包括這些東北亞外族。但陳壽技巧性的將東北亞外族解釋為東夷，從而如夫餘、韓、倭等外族的歷史成為可探索的知識對象。

范曄《後漢書·東夷傳》更是進一步建立過去所無的東夷論述，以因應東北亞政局的劇變。其序言的開頭就引《禮記·王制》曰：「東方曰夷。」其目的是證明東夷歷史也是儒家經典的知識系統之內。該文其後則說東夷之人有相當的文明性，因此「孔子欲居九夷也」。

如前所論，經典中的東夷是一個戰國以來的新概念，與之前諸文獻紀錄中的夷沒有概念相承的關係。而范曄的〈東夷傳〉則刻意建構這個關聯性，目的在使東北亞外族成為東夷，東北亞也被包攝在經學的空間範疇中。

范曄的〈東夷傳〉舉證了經典中的若干例子以證明中國王權與東夷歷來就有關係。這段序言中引用經典所提及的具體東夷，如周公東征所平定者及徐偃王所治理者。這些地區即該序文所說的「淮、

岱」，或「淮、泗」。此華東地區在秦漢皇帝制度下，成為郡縣區域，其民為所謂編戶之民。也如該序言所說：「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這類的東夷在秦漢以後自然失去了蠻夷的資格。於是順著該序文的脈絡，到了漢代以後，東夷只剩下東北亞的外族。該序言又說：「武帝滅之(衛氏朝鮮)，於是東夷始通上京。」東夷已專指東北亞的外族。朝鮮(其後為樂浪郡)與遼東(曾屬中國郡縣，故其民也不屬東夷。於是東夷就用來描述漢末以來中國開始接觸的今天中國東北、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族群。《後漢書·東夷傳》所述的外族與《三國志·東夷傳》同，為夫餘、高句麗、挹婁、東沃沮、濊、韓與倭。這也反映了東夷如何從經學中的想像集體到具體的指涉對象，且從中國的華東轉移到東北亞。²⁶

上文討論了正史論述的經學性格，這當然不能證明正史外夷傳所載盡皆事實；筆者不過只想藉此說明中國官方在編纂史籍時，原則上不會杜撰域外的歷史文化。因為在儒家經典主義的信念下，不需要展示對於域外地區的認識。但也正因為儒家經典主義，使我們要對某些紀錄的真實性採取保留態度。這種經典主義的信仰，會使觀察者或記錄者以現狀比附經典，甚至創造現狀以符合經典所述。這也是我們要對這些紀錄進行批判的原因之一。

總之，陳壽《三國志·東夷傳》是現存文字史料中，記錄東北亞諸民族、政權的最古資料。史料價值極高。東北亞諸政權、民族之

²⁶ 如汪啟明，〈東夷非夷證詰〉論《禮記》等經典中所記的東夷，與《後漢書·東夷傳》所記載的東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這是正確的結論，只是我要進一步強調，經學中的東夷說本身就是一個想像的集體概念，而《後漢書》則是根據此概念衍繹，而論證高句麗、韓、倭等人群屬東夷。就范曄本人的主觀而言，他並不認為他的東夷與經典的東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被記錄下來，是因為漢末、曹魏時東北亞的建國運動、移民運動以及中國政權的介入等因素。這些紀錄的產生不是基於中國對於域外的知識興趣，也不是要建構支配的世界像。若只是關於世界像，經學的論述已足夠。筆者並非要證明《三國志·東夷傳》的史料是可信的，反而是想強調這些史料都應該放在批判懷疑的前提下被認真地重做檢驗。只是，所謂「几上作業」之說是不成立的。

三、《三國志·東夷傳》所載的東夷王權

冊封體制是當今歷史學在論及中國與域外國家關係時的重要理論。²⁷所謂冊封體制，綜合扼要而言，是歷史上的東亞世界各國依據中國王權的天下理論，其首長向中國天子(皇帝)朝貢並接受官職的冊封，而與中國天子間締結君臣關係。這些國家及其首長的正當性與國際地位由其所得的中國式官職所決定。典型的事件是外國君主或其代表到中國皇帝的朝廷，向皇帝行稱臣之禮，並受冊封所治之國的王爵。²⁸但目前的學說對於這種制度源於何時缺乏明確說法。學者也就籠統的視冊封體制始於漢代。²⁹這種推論出於冊封體制與郡縣制是一體兩面的預設。中國天子宣稱治天下。究其實況，郡縣域內為實際治理，而郡縣域外則是藉冊封與朝貢的形式。這種推論也預設了郡縣內外是一條清楚的界線。其內是郡縣。其外是所謂蠻夷之

²⁷ 甘懷真，〈東アジア世界の冊封体制と儒教〉、〈東亞古代冊封體制中的將軍號〉。

²⁸ 精確而言，這裏的中國，既可指秦漢隋唐王朝所表現的中國，亦可指自認為其首長是天子的中國政權。後者主要是指日本。但本文只討論以中國天子為中心的冊封體制。

²⁹ 參見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明圈的探索——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頁 75-92。

國。基於這樣的認識，郡縣制與冊封制是在同一條軌道上發生。即使冊封體制的完備可能會稍晚。

但近年來的漢代郡縣制研究也讓學界有機會重新認識冊封體制。主要是拜新出土文物研究之賜，我們對漢代郡縣制有了更正確的認識，進而修正了既有的郡縣制理論。³⁰現今，我們甚至應改稱漢代的地方政治制度為郡國制，而非郡縣制。郡國制概念對於漢代史研究而言是耳熟能詳，但舊說側重於地方政治制度中的郡與國並立。對於郡國制的新認識，其關鍵點在於郡與縣的關係。郡所轄之縣包括封建性質的國、邑等政治單位。這種現象在邊郡尤其明顯，邊郡之下轄有所謂蠻夷之人的屬邦、屬國。

依據既有的從封建到郡縣的學說，漢代以後，中國成為郡縣，而郡縣之外為藩屬之國。再依冊封理論，這些藩屬國向中國天子朝廷朝貢並受冊封；但新的郡縣制研究(或稱郡國制研究)也讓我們理解郡縣區域內的封建之國的實存及其重要性。在經歷秦始皇所謂「統一中國」之後，中國沒有出現從封建到郡縣的斷裂，各種封建制度存在於漢代政治制度中。另一方面是重新探究邊郡及其屬國。關於漢代邊郡，早有很好的研究成果。³¹又因近年學者通過秦簡等出土文物的研究，讓我們重新思考秦漢時期的邊郡與蠻夷屬國制度。³²扼要言之如下。

漢代的邊郡所統轄的範圍及對象包含蠻夷之國與蠻夷。而這類蠻夷之國以屬國、屬邦的性質而成為該郡之下的縣。依郡國制的原

³⁰ 在此略舉若干重要的研究文獻：卜憲群，〈秦漢之際國家結構的演變——兼談張家山漢簡中漢與諸侯王國的關係〉；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漢初侯國隸屬關係考〉；阿部幸信，〈漢初「郡國制」再考〉；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

³¹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頁 154-165。

³² 胡小鵬、安梅梅《近年來秦漢屬國制度研究概述》。

理，郡下之縣亦可以是國(縣國、侯國)。而此類縣國的性質是封建的，一方面對於其上之郡，擁有相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其首長可由一個政治集團世襲。因為縣國具有這樣的政治性質，故蠻夷之政治集團可以被包納在郡國制下。漢代的邊郡如遼東、樂浪、玄菟郡等，其下設有支配蠻夷集團的縣。這些蠻夷政治單位的首長既隸屬於郡政府，亦可獲得中國官方所給的官職，如王、侯、邑君、三老等。亦即這些蠻夷的政治單位是以封建的國的性質而存在於中國的郡之下。從這個角度看，這些蠻夷之國是漢朝所轄郡縣的一部分，換言之，是在郡縣的內部，而非其外部。

筆者無意論證漢代的這類蠻夷之國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謂的「領土」，是構成近代民族國家概念的有機一環，持以討論古代歷史，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本文只想說明漢代中國週邊的蠻夷諸國，在制度上是屬於漢代郡國或郡縣的一部分，而藉此重新思考所謂的「冊封體制」。如我們在探討漢代域外蠻夷首長冊封或朝貢現象時，會將這類首長向邊郡政府朝謁視為冊封體制的例證。但這種論點是否正確可以商榷。因為這類的蠻夷集團在名目上是屬於邊郡政府，而非是冊封體制學說所想像的自主性的外國。此外，這類蠻夷政權不是直接向漢國家(天子)朝貢或受冊封。

漢魏之際，上述的蠻夷屬國現象是否有所改變，這是本文所探討的重點之一。《三國志·東夷傳》提供了我們觀察第三世紀前期變化的證據，非常珍貴。本節即藉由《三國志·東夷傳》的考證以探討東夷諸王權(如高句麗、新羅、百濟)如何從漢代邊郡的縣國轉型為自主之國的過程，尤其是各國的建國運動與東北亞國際局勢的關係。當時有二股勢力在東北亞地區的擴張與對抗，一是中國邊郡的擴張(遼東郡、樂浪郡、帶方郡)，二是高句麗的建國運動。而關鍵性的事件則是正始五年至六年間(244-245)，中國方面以毌丘儉為主帥的征高句麗的戰

爭，本文稱之為「正始高句麗戰爭」。³³

如前所述，中國官方對於東北亞的知識來自於這場戰爭。上一節引《三國志·東夷傳》之序，該文說明陳壽為何得此紀錄，是拜中國軍隊侵入此區之賜。其一為景初二年(238)魏朝廷派司馬懿消滅了遼東公孫氏政權。其後，中國朝廷再次派兵以武力征服了樂浪、帶方二郡。其二是正始五年至六年的高句麗戰爭。〈東夷傳〉曰：「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³⁴

中國的軍事勝利深刻的改變這個區域的政治狀態。239 年倭女王卑彌呼遣使向曹魏朝廷朝貢並受冊封，此即赫赫有名的「親魏倭王」事件。此事件當是這次中國軍事勝利的結果。³⁵如本文所欲論，辰王的成立亦是這個政治變化的一環。以下先考察《三國志》所記錄的東北亞的政治局勢及其變化。

〈東夷傳〉記錄了夫餘、高句麗、東沃沮、挹婁、濊、韓與倭等政權或人群。其中夫餘、高句麗、東沃沮與濊明顯是中國郡國制下的縣層級單位。以下先討論夫餘。〈東夷傳〉記錄夫餘「本屬玄菟」，這是明確說明夫餘是玄菟郡下的縣級政治單位，而夫餘的首長應是玄菟郡下的縣國君主，當為縣侯。〈東夷傳〉又記夫餘「歲時遣使詢京都貢獻」，即至洛陽朝廷朝謁中國天子。³⁶據此推測夫餘首長不只向玄菟郡朝謁，而直接赴洛陽朝廷。這當是因為夫餘的強大。而中

³³ 因為 1906 年「毋丘儉紀功碑」的發現與解讀，這場戰役的時間得以確知。經典性的研究參見池內宏，〈曹魏の東方經略〉。

³⁴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0。

³⁵ 親魏倭王冊封事件是事出多因，與當時東亞複雜的國際關係有關，本文只強調若干面向。更整體的分析參見西嶋定生，〈親魏倭王冊封に至る東アジアの情勢——公孫氏政權を中心とした〉。

³⁶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2。

國天子也因為這個機緣而封夫餘首長為王。

這種縣級蠻夷首長為王的例子並不特別，西漢即如此。王莽曾作出改革，將一些蠻夷首長的王爵降為侯爵，如西南夷地區的牂柯郡句町縣。³⁷句町縣當為一縣國，其長官縣侯是蠻夷君長。但西漢朝廷卻封為王，王莽執政後，改句町王為侯。³⁸依郡國制原理，王莽的改革是有理的。但中國天子為示對蠻夷之恩，常破例冊封縣級的蠻夷君主為王。東漢授與蠻夷君主為王之例更多見。以下再舉數例。

東漢和帝永元十一年(100)，有蜀郡之「徼外」蠻夷王唐繒等「歸義內屬」，漢朝賜給「金印紫綬」。所謂蠻夷王的稱號也當來自漢朝授與的王爵。³⁹又如順帝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漢朝廷亦賜與金印紫綬。葉調王一稱也當來自漢朝廷所封。⁴⁰我們也很容易想到「漢委奴國王」印的例子。此受封的奴國王亦是得到金印紫綬。金印紫綬在漢制中是列侯的標記，《後漢書·百官志》曰：「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⁴¹可知列侯是相當於縣之侯國或更小的鄉、亭的政治單位首長。這一類的蠻夷之王的實際封建等級是縣侯，但因天子之恩而在頭銜上升為王。

其次是高句麗。據《三國志·東夷傳》，高句麗也是玄菟郡治下的縣國，或稱侯國。其文如下：

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簿。
後稍驕恣，不復詣郡，……王莽……州郡縣歸咎于句麗侯駒，……

37 《漢書》，卷 28 上，頁 1602。

38 《漢書》，卷 99 中，頁 4115。

39 《後漢書》，卷 4，頁 186；卷 86，頁 2857；卷 11，頁 3236。

40 《後漢書》，卷 86，頁 2837。

41 《後漢書》，卷 28，頁 3630。

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句麗王)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⁴²

其重點如下：第一，高句麗的人群集團原本屬於玄菟郡之高麗縣管轄。但其後自主性勢力漸大，不受制於中國郡縣。在西漢的某個時間點成立了(高)句麗縣侯國。於是在王莽的時代有「句麗侯」。第二，東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至洛陽朝貢，於是從侯爵升為王爵，成為「句麗王」。但在制度仍是邊郡的郡國體制的縣等級，在東漢屬於玄菟郡。其縣國與王爵的制度原理同於夫餘。

再者是東沃沮，〈東夷傳〉的紀錄如下：

(西漢)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于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漢建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⁴³

同樣依郡國制原理，西漢時沃沮集團之人屬樂浪郡，其後由樂浪郡之東部都尉管轄。東部都尉下設七縣，沃沮為其中一縣。東漢光武帝時，沃沮縣改為縣國，即侯國，漢政府不再派流官為首長，而是以沃沮之「渠帥」為縣侯，仍隸樂浪郡。

第四是濊。據〈東夷傳〉，濊是一「種」，即人群的名稱，不是一個政權名。該傳曰：「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⁴⁴可推知濊沒有形成統一王權，而只在漢朝邊郡的

⁴²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3。

⁴³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6。

⁴⁴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8。標點本以「侯邑君」為一詞，當誤，應改。

支配下，形成縣層級的統治集團，如侯、邑君。該傳又曰：

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高麗。……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⁴⁵

參考前引東沃沮的記載，樂浪郡東部都尉領七縣，其中一縣是不耐。東漢光武帝後，這一類的縣改為侯國，其首長為不耐濊侯。在〈沃沮傳〉中，記東漢時，「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⁴⁶可知這七縣中，中國邊郡政府亦無力控制，故這些樂浪郡所屬侯國即使不是名實俱亡，也名存實亡，唯有不耐縣仍在若干程度上服從中國的支配。

濊的事例亦可見正始高句麗戰爭的影響。在這一場戰爭中，不耐縣侯向魏軍投降。這個舉動的另一面反映了此不耐縣的蠻夷政權的長期自立性，或其後受到高句麗的威脅而與中國的關係漸遠。這場戰爭結束後，此不耐侯向洛陽的魏朝廷朝貢，並受冊封為「不耐濊王」。這也如前所述縣級蠻夷首長封王之例。

該傳又曰：「(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⁴⁷據此又可推知如下。不耐濊王的王權層次甚低，甚至沒有作為統治根據地的城，故調雜處民間。其次，正始八年的「詣闕朝貢」是特例，不耐濊王仍作為中國的縣層級而向邊郡朝貢。再者，所謂「遇之如民」，是中國方面的用語，同樣是展現天子之恩。究其實卻是不耐縣之濊民被轉化為提供中國賦役

45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8-849。

46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6。

47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9。

的編戶之民。這應是正始高句麗戰爭的結果。這場戰爭的起因與結果是東北亞的幾個強權如夫餘、高句麗與中國(曹魏)爭奪農業勞動人口。而各新興王權(包括中國邊境政府)爭奪農業人口當是三世紀前期東北亞政治劇變的主因之一。

最後是挹婁。據陳壽記載，其地離中國邊郡甚遠，也一直與中國沒有直接的政治關係。陳壽記載此國的原因，或是基於「九夷」之數的信念。漢代時，挹婁是夫餘的屬國一類，但在曹魏黃初年間，挹婁與夫餘發生戰爭，〈東夷傳〉所說的理由是「夫餘責其租賦重」。⁴⁸這可以被理解為夫餘在建國的過程中爭奪「民口」的行為。在正始高句麗戰爭中，夫餘也歸順曹魏。中國軍隊也可能進入了挹婁。但陳壽的描述簡略，隻字未提挹婁與中國的政治關係。⁴⁹

在此先作一個歸納。陳壽在描述東夷的政治狀態時，有三種型態。一是明載有王者。這一類有夫餘及高句麗。如〈夫餘傳〉曰：「國有君王。」也記載其中幾位夫餘王，如「夫餘王尉仇臺」。⁵⁰夫餘為一國，其國有王。高句麗也是「其國有王」。⁵¹第二類是明言無「大君長」。這一類是挹婁與濊。前者是處於較原始的政治狀態，該史料曰：「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⁵²即挹婁作為一個人群集團，只存在多數的「邑落」首長。濊的狀態則如前引的史料曰：「無大君長，

48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8。

49 二十世紀前期以來，日本學者重視滿洲研究，故有很多經典論著。關於正始五、六年的這場滿洲戰役，可參考池內宏，〈曹魏の東方經略〉；和田清，〈魏の東方經略と扶餘城の問題〉；三上之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頁 225-230。

50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2。

51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3。

52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7。

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⁵³三是史無明言。如東沃沮之例，〈東夷傳〉曰：「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國小，迫于大國之間」，⁵⁴可推論東沃沮亦無「大君長」，只有相當於縣、鄉級的首長。

由此可再進一步推論，陳壽所謂的東夷「大君長」或「君王」，已不再是漢代的縣級或以下的蠻夷之王，而是更廣域的政治領袖。就中國而言，是相當於郡級的政治首長。《三國志》所出現的新王者觀，當是相應於這個區域的王權發展，自主性大國的建國運動出現。⁵⁵

四、辰王成立與新型態的冊封

接下來的討論將轉到朝鮮半島南方的(諸)韓國，再藉此考察辰王的成立。以下先分析正始年間韓國戰爭前後的韓國政局。

曹魏政權在掌握了樂浪與帶方郡後，同樣執行半島南方控制的政策，甚至比公孫氏政權更強勢的支配韓地。《三國志·韓傳》記魏明帝時中國王權收復樂浪、帶方二郡後，有如下記載：「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所謂臣智，是韓國諸國中大國的首長。此記載可見於〈韓傳〉中的「馬韓」條與「弁辰」條。我們可以推測公孫氏政權在建立帶方郡後，加強了與韓地諸國首長階層間的政治聯繫。只是此政治關係的型態，無史料可以論證。當公孫氏政權被消滅後，曹魏政權在其基礎上，更藉由授與(諸)韓國的諸政治領袖邑君、邑長等頭銜，而將韓國納入中國郡縣的支配領域中。

《三國志》的陳述方式表現一種中國立場，即天子之恩，如賜與

⁵³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8。

⁵⁴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6。

⁵⁵ 參見井上秀雄，〈『三國志』の東夷王者觀〉。

印綬、衣服等被視為來自中國的恩惠。但中國的這項郡縣化運動相當程度的引發韓國的政治變動，進而發生了中國與韓國的戰爭。〈韓傳〉敘述這次戰爭。這段史料不易解讀，先抄錄於下：

部從事吳林以樂浪郡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⁵⁶

其時間應該在 246 年至 247 年間。⁵⁷從該段史料推論，部從事吳林將隸屬於帶方郡的八韓國改隸樂浪郡，而此八國屬於辰韓。其下文「吏譯轉有異同」等，當是中國方面將這次戰爭的起因歸咎於「吏譯」的錯誤，即支配蠻夷的翻譯官員的傳話誤失。「臣智激韓憤」是一難解之語。⁵⁸帶方郡的崎離營在何處亦不明。無論如何，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戰役，中國方面出動帶方郡與樂浪郡二位太守，而二郡的兵力當隨之出動，帶方郡太守弓遵甚至戰死。結局是中國的二郡獲勝。

這場戰爭被稱之為正始韓國戰爭。深究之，可再追回到 238 年的曹魏滅公孫氏政權戰爭。中國王權消滅遼東政權，再收復樂浪、帶方郡。接下來是正始高句麗戰爭打敗了高句麗，並威服夫餘。這場韓國戰爭是這一系列戰爭的延續。而本文無意解開這段史實的難處，只將焦點置於韓國政局分析。一說認為，曹魏政權收復樂浪、帶方郡後，積極介入韓國政局，而扶植了辰王政權。於是辰王作為韓國的代表，並負責與中國聯繫。在韓國戰爭後，以辰王為仲介而

⁵⁶ 《三國志·韓傳》，卷 30，頁 851。

⁵⁷ 從經典性研究的池內宏著作開始，就主張這個時間點，筆者也以為正確。其考訂見池內宏，〈公孫氏の帶方郡設置と曹魏樂浪・帶方二郡〉。

⁵⁸ 有學者根據百衲本質疑是現行《三國志》的錯誤，參見末松保和，《新羅史の諸問題》，頁 121；栗原朋信，《上古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頁 129。這二位學者主張「臣智激韓憤」當是「臣憤沾韓忿」。即使如此，這仍是一句難解之語。

共立的韓諸國連合政權就消失了，而個別屬於帶方郡。⁵⁹然而，這是事實嗎？

上引〈韓傳〉中史料只云：「臣智激韓憤」。故推測戰爭的主導一方是韓諸國的領導層，或此領導層的核心組織。從〈東夷傳〉的體例來看，此歷史事件是接續於描述馬韓政治社會狀態之後，屬於「馬韓」條，故陳壽認為戰爭的韓方主體是馬韓。這裏的臣智是馬韓的臣智。而這段描述完全看不到辰王存在。這有二種可能。一是在戰前的辰王只是韓地諸國的象徵性首長。二是戰前根本不存在辰王。

另一問題是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如前文所推論，在正始高句麗戰爭後，中國進一步將韓地郡縣化。所謂「割辰韓」是此郡縣化的一步驟。一般的研究將三韓之韓國視為一個政治整體，而相對於中國。但實情並非如此，我們不應忽略三韓本身的政治衝突。關於這場中韓戰爭的史料，還可以找到下面這條出於《三國史記》的〈百濟本紀·古尔王〉條者：

魏幽州刺史毌丘儉，與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遵王，伐高句麗，王乘虛，遣左將真忠，襲取樂浪邊民。茂聞之怒，王恐見侵討，還其民口。⁶⁰

此是發生在百濟古尔王時的事件，推算時間是246年。從相關的人事物判斷，顯然是此次韓國戰爭的一環。百濟乘中國入侵高句麗的機會，「襲取樂浪邊民」。所謂「樂浪邊民」當指樂浪郡南方邊界附近之民，但確實的意義不易判讀。而《三國志·韓傳》留給我們另一段記載可供參考，曰：

桓、靈之末，韓滅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

59 李成市，〈古朝鮮から三国へ〉，頁47；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頁109。

60 金思燁譯，〈完訳三国史記〉，頁472。

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⁶¹

這是記帶方郡源起的有名史料。在第二世紀末的漢末，原樂浪郡居民向境外的韓地移入。當公孫氏政權強大時，就將這些移入樂浪郡南方的人民編成新的郡縣。但我們可以推想，中國王權(含其邊郡政府)與韓國王權(如百濟)在此爭奪所謂「民口」的行動一直持續。上引《三國史記》的事件亦是這場長期的民口爭奪戰的一部分。而中國方面史料所說的「割辰韓八國屬樂浪」無疑也是一系列鬥爭的一環。

由於史料有關，我們無從追求這場戰爭的細節。若我們以認識大歷史為目的，戰爭細節或許可忽略。這場戰爭很清楚的是各強權掠奪「民口」而造成的。這些強權包括中國的邊郡政府、高句麗與韓國中的大國，如百濟。一些學者設定這場戰爭是韓國作為一體以對抗中國，而韓國的戰敗導致以辰王為代表的統一韓國政權的瓦解。⁶²或許事實並非如此。介入這場戰爭的中國方面是「二郡」，即樂浪郡與帶方郡。即使二郡的背後有中國王權撐腰，但實際與韓國發生關係的是此二郡。又從百濟襲取民口之例推論，韓國自身面對大國崛起，也是彼此征伐。韓國本身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更不用連辰王存在與否也應存疑。這場正始韓國戰爭不是中韓王權的對決，而是各強權(樂浪郡、帶方郡、高句麗、百濟等)為爭奪土地與人民的軍事對抗。中國的文獻雖宣稱「滅韓」，實際上是戰後各強權在此分享權力，並繼續人口爭奪戰。

有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是中國欲消滅韓國的統一王權，調欲分裂韓國。⁶³這是基於一種預設，即中國王權不容許其週邊存在大國。但這種中國霸權說只能說是想當然耳，沒有證據支撐。其一，戰前韓

⁶¹ 《三國志·韓傳》，卷 30，頁 851。

⁶² 李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頁 249。

⁶³ 李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頁 249。

國是否存在統一王權，仍值得深究。如下文所論，從《三國志·韓傳》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其二，《三國志·韓傳》刻意要塑造辰王是韓國的統一王者的形象。陳壽的論調當反映曹魏政權的立場。其三，曹魏冊封「倭女王」也是另一例子，證明中國王權並不反對其域外出現自主性的大國。

在進入辰王課題之前，再利用一些篇幅以分析〈韓傳〉中所敘述的韓諸國的政治狀態。在〈韓傳〉的描述中，韓地上有諸韓國。如馬韓有五十餘國。〈韓傳〉的「馬韓條」記其「國」是「各有長帥」，其長帥以當地語言稱之為「臣智」、「邑借」。在中國觀察者眼中，這類國的政治型態很原始。〈韓傳〉記韓地的狀態如「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⁶⁴此當可信。即國(邑)的首長只是當地部落聯盟的主席。又這類統治者不是城居。〈韓傳〉曰：「(國之長帥)散在山海間，無城郭。」⁶⁵亦即「城支配鄉」的政治體制尚未成立。《三國志·東夷傳》在記載各政權或人群時，有統一的體例。其內容分二部分。前面是政治、經濟、文化的狀態，後面是正始高句麗戰爭的相關歷史。所以可以推論〈東夷傳〉所記述的現象存在於第三世紀中期，尤其是約 245 年至 280 年間。故上述的韓國政治狀態可以 245 年前後為基準。在這種政治基礎之上，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在國之上有統一王權存在。但是〈韓傳〉沒有明言「無大君長」，卻又記載了辰王。我們應如何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

本節將集中考證《三國志·韓傳》所載的這段史料，為解說方便，稱之為 A 史料：

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踰支潰臣離兒不

⁶⁴ 《三國志·韓傳》，卷 30，頁 851。

⁶⁵ 《三國志·韓傳》，卷 30，頁 849。

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

這段史料可分為三部分：一是「辰王治月支國」，二是「臣智或加……之號」，三是「其官有魏率善」之後一句。其一，陳壽記馬韓有五十餘國，其中有月支國，而辰王的治所在此。⁶⁶依其文脈推論，陳壽當認為辰王是此五十餘馬韓之國之王。但《三國志》並未明言此點，也如下文所論，陳壽並未明言辰王與韓諸國的關係，反而後出的《後漢書》明言辰王是馬韓諸國所「共立」。

「辰王治月支國」字面上容易理解，但就史書體例而言，「某王治某地」的寫法，是指該王為諸國聯盟之首長，而其治所設在該地，一般都是一座城，在《漢書》中有許多例子，但王者所治為一「國」之說則獨特。辰王是否為月支國的首長，再以月支國首長的身分而為韓國的共主？其實這個問題不容易解答，至少陳壽的敘述非常曖昧。

第二部分是〈韓傳〉中，就字面而言最難解的，目前的標點本亦無法斷句。從十九世紀後半期日本學者進行東洋史研究開始，就認為這一串文字是包含國名與官名一類的稱號。這一段話是在說幾個國的臣智的加號。月支國的臣智的加號有「優呼」。其後則是四組的「國名＋官名」。所謂「國」是指韓地諸國。至於是那些國及那些官名，自是聚訟紛紜。總結目前的學說，四韓國是臣雲、安邪、臣漬與拘邪。若對照《三國志·韓傳》，一說認為臣雲即馬韓之「臣雲新國」，安邪即弁韓之「弁辰安邪國」，漬臣即馬韓之「臣漬沽國」，拘邪即弁韓的「弁辰拘邪國」。⁶⁷舉例而言，臣雲新國的臣智加號為

⁶⁶ 《三國志·韓傳》，卷 30，頁 848。

⁶⁷ 那珂通世，〈三韓考〉，頁 129；白鳥庫吉，〈漢の朝鮮四郡疆域考〉，頁 318；栗原朋信，〈上古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頁 117-118；金榮來著，中山清隆譯，〈百濟南方境域の変遷〉，頁 311-312；李丙燾，〈韓

遣支報。學者推論，此四國之首長(臣智)之所以獲得加號，是此四國為辰王主要的聯盟國。

但這種國名說是可以商榷的。國名說真的可信嗎？A 史料中，臣雲、安邪等詞彙的確相近於〈韓傳〉中所記錄的臣雲新國、安邪國。但臣雲新國等國名是明記於〈韓傳〉中，陳壽理所當然知道這些國名。而這些國名在史料 A 中被縮寫(如臣雲是臣雲新國)，甚至誤寫(如漬臣是臣漬沽國、拘邪是弁辰狗邪國)，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沒有理由因為這些詞彙近於韓國之國名，而判斷其為國名。在漢字不通行朝鮮半島南部的時代，國名與官名都是來自於中國記錄者且以漢字借音的方式表現，我們實在無法以漢字詞彙去做過多推論。

國名說不只關乎考據，也與辰王的性格有關。四國說是主張韓國的七十餘國中有四國的臣智加尊號。推其原因，是此四國與辰王的關係密切，是辰王的政治同盟，且為派出機構。若此為事實，可推論辰王王權是如何控制全韓地。如此構思當來自於日本學者從大和王權而來的聯想。大和王權自第五世紀後半有重大發展，其中之一是由豪族集團的祖名而來的氏姓制度。日本列島的主要豪族通過氏姓制度而與畿內的大王建立政治關係，此類姓氏是由大王(及其後的天皇)賜予的神聖職務與地位。但第三世紀中期朝鮮半島南部一般的政治狀態中，王權顯然沒有發展到這種地步。再者，在〈東夷傳〉中，陳壽記錄了夫餘的「四出道」，以及高句麗的「五族」制度。⁶⁸扼要而言，夫餘的王權機構在其統治境內的四個要點，設置派出單位。高句麗的統治集團也分為五族(部)，王權機構是這五族的聯盟。可見陳壽是有這類政治結構的概念，若辰王王權亦有，陳壽沒有隱晦不載

国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頁 268；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上)〉、〈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下)〉。

⁶⁸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1、843。

的道理。故辰王與韓國中之四國聯盟之說，當不能成立。

總之，A 史料的第二段中應無國名。至少陳壽在抄錄這段史料時，並不認為這其中包含他已記錄過的國名。我們將這一串詞彙視為韓國的官名、尊號的借音漢字應更為合理。優呼以下的這串文字，應該被解讀為臣智的加號，至於這段加號如何斷句，另當別論。所謂加號之說，應該是一種中國觀點。臣智是韓國稱呼其國的「長帥」的借音漢字。但對於這類首長，當還有不同的稱呼法。中國的記錄者將這些多元的官名或尊號稱為加號。或許它們是一種敬稱，或標示祖先的由來。但都無可考。有學者相信《三國志》的紀錄是直接由政府檔案抄錄的，故有些部分較為雜亂無章。⁶⁹我支持這個說法，「臣智或加」下面這一段紀錄就是一例。

月支國為辰王的治所，但亦有臣智，其證據亦來自《魏略》。該史料曰：「三韓各有長帥，其置官大者名臣智，次曰邑借。……辰王治月支國。月支國置官，亦多曰臣智。」⁷⁰月支國是月支國的另種記法，《後漢書》即稱月支國。至於孰是孰非，難以辯證，本文也略去不論。若此條史料可信，則辰王不是月支國的首長，只是治所設於月支國。月支國自身有其臣智，而臣智才是月支國的治理者。

接下來討論 A 史料的第三部分，即置官問題。這段史料記錄辰王官員所受的中國式官職。依文脈判斷，這些官職當是針對辰王而言。即辰王之下設有「魏率善」至「伯長」的官職。這類官職相對於「臣智」、「邑借」或「優呼」一類當地風俗的官稱或尊號的漢字表現，是一種中國官職。且其前加「魏」，更明言是受自中國之魏。這可聯想到同一時期的倭國之例，即倭女王卑彌呼於 239 年遣其國的官

⁶⁹ 參見井上幹夫，〈『魏志』東夷伝にみる辰王について〉。

⁷⁰ 張處金撰，雍公叡注，《翰苑》，〈蕃夷部〉，「三韓」條，頁 2516。

員難升米與牛利來洛陽朝見魏天子的著名事件。中國方面除冊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外，同時任命二位使者難升米與牛利分別為率善中郎將與率善校尉。此事記於《三國志·倭人傳》。⁷¹

因此可推論辰王條中的「魏率善」之官，即辰王屬下官員從中國所得到的率善中郎將、率善校尉之類，依獲授官職之對象的原政治位階而定不同等級之率善之官。「歸義」一稱更是中國用來界定外國人的政治立場之詞，作為中國官職更是無疑。西漢即有外國高階官員為歸義侯之例，至東漢更制度化，如《後漢書·百官志》所記：「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即將外國的統治者所得的中國官爵對照郡縣等級。歸義侯算是第三等。魏晉的確有歸義侯的冊封，由於目前資料查詢容易，省去不論。而此條中尚有「邑君」，也是上引《後漢書·百官志》所記的官名。此外，中郎將、都尉都是當時的中國官名無疑。雖然就本條史料而言，仍有難解處。如比較〈百官志〉，何以邑君在歸義侯之前，是有抄錄錯誤之嫌。但中國的政治傳統不一定完全遵守正史所載的一時的規定，故真相難明。其實這無妨我們的認識。此處的中郎將、都尉，當是率善中郎將、率善都尉。至於最後一個「伯長」，當即「佰長」。曹魏有「率善佰長」之官名。此職是中國政權授與外邦的地方首長的官職，此人當是治理百戶之長。韓國尚州出土「魏率善韓佰長」之印章，除可證佰長之官名的存在，也可見「佰長」之上加有「率善」。⁷²此也間接證明「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的正確標點及意義當是「魏率善邑君、(魏率善)歸義侯、(魏率善)中郎將、(魏率善)都尉、(魏率善)伯長」。

71 《三國志·倭人傳》，卷 30，頁 857。

72 參見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下)〉。

由於這是中國官方的紀錄，故這些官職不可能是辰王政權的自稱，一定是得自於中國天子的中國式官職。而從辰王屬下的中國式官名推論，此辰王必然是中國朝廷所冊封，雖然史籍無載，或有「魏辰王」或「親魏辰王」類的封號，其下才有中國式的邑君、侯、中郎將一類官職。

相對於《三國志》記錄蠻夷之王下的設官，辰王是特別的。這點應提出來討論。其所設之「官」皆是中國式的官職。其對照組有高句麗王下之設官：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臺丞、使者、皁衣先人。其中主簿、使者可能是翻譯之官名，而其他都是在地官名。這顯示在第三世紀中期，高句麗對於中國而言，已是自主之國，故其官以在地之名稱之。

另一例子是〈東夷傳〉中所載之濊，其紀錄曰：「其官有侯、邑君、三老。」這段史料已在前文討論過。這種官職表現法反映了濊地的政治團體是作為漢朝郡國制的一部分，故是郡之下的縣國、邑、鄉的行政單位。

由此判準再看辰王，則可以認定辰王所治是一種新型態的屬國，也具有過渡性質。一方面，它是中國(曹魏)的屬國，另一方面則不隸屬於中國的郡縣。

又，參照 A 史料第二部分的月支國的臣智紀錄，可知月支國有二套官制：其一是臣智，其二是辰王屬下的中國式官職。前者亦如前引《魏略》所云：「目支國置官，亦多曰臣智。」「多曰」云者，因其官亦有稱優呼等。我們不清楚這二套官職是否有重疊。但筆者傾向認為它們是分開的。即辰王作為韓國之王者，其下有二套官職，一是來自在地支配體制，以各國的臣智為首長；二是來自冊封體制。而由此可以看出兼具一種新型態的蠻夷屬國。

辰王的誕生也是在新的冊封體制的政策下。根據《三國志·韓

傳》，在 246、247 年的正始韓國戰爭之前，以及 238 年滅掉公孫氏政權之後，曹魏政權授給韓國的首長(臣智等)邑君、邑長的封號。這是延續漢代的政策，將蠻夷的政治組織納入邊郡的縣體系內。不久發生本文所謂的韓國戰爭。〈韓傳〉記此事件，最後曰：「二郡遂滅韓。」沒有其他證據知道何謂「滅韓」。但可推論「滅韓」的結果是辰王的設置，亦即韓地被中國政權建構為屬國。制度面的重點有二。一，整個韓地歸一位王者治理。二，該王者由中國冊封，且其政治組織為中國式的。後面這一點由 A 條中的「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可推知。

若這個推論可成立。則我們也解開了辰王是何時冊封之謎。若從體例推論，《三國志·東夷傳》所記載的史實的時間帶是在正始高句麗戰爭前後，即以這個時間帶中的現狀為根據。該〈韓傳〉沒有記載辰王滅亡，反而是花篇幅鋪陳了辰王與三韓的關係。故依《三國志》體例來推論，辰王政權是存在的。而目前可根據的也只有《三國志》，故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辰王政權在正始韓國戰爭後滅亡，甚至應該反過來認為辰王政權是始於 238 年戰爭之後。一如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向曹魏朝廷朝貢受封之事，因為中國王權的擴張，以及日本列島本身的大國崛起，此女王國決定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筆者推測韓地的月支國政治領袖，也是基於同樣的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化，在這段期間向中國朝貢並接受冊封，其封號為辰王。

更有可能的時間是正始韓國戰爭後。〈韓傳〉的史料記曰：「二郡遂滅韓」。「滅韓」是中國官方的一種說法，我們不能逕以為韓國勢力真的臣服於中國王權。「滅韓」之說只能視為中國在這裏推行新的屬國政策。即中國將「韓」視為一個政治單位，而任命一位王者為首長，且其政府是中國式的政府。這位首長辰王。《三國志》記景元

二年(261)事，曰：「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⁷³此處韓當是以辰王為代表。

若採 246 年後的說法，則一些疑點可解決。若曹魏冊封辰王是在曹魏王朝開始的 220 年至 245 年間，則難以想像這至多二十五年間，辰王在中韓戰爭中已不是韓國的領袖。⁷⁴其次，〈韓傳〉雖未明言韓國無「大君長」，但其所描述政治社會狀態的確如此。我們很難想像諸國之上有一個統一的行政首長，而這個統一的韓國首長是在 246、247 年戰爭中被中國消滅。

五、辰王與韓諸國的關係

以下檢討辰王與韓諸國的關係，主要考證以下史料 B。

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

這段史料記載，三韓中的弁韓與辰韓共有二十四國，其中十二國屬辰王。其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一般歷來難解，爭訟不已。茲辯證如下。

我們可以歸納出一派意見，本文稱為舊說。此舊說認為，辰王由馬韓人擔任，辰王雖可世代相續，但不得自立為王。⁷⁵然而，這是誤讀史料。正確的解讀當是如下。辰王依習俗以馬韓人為諸國之

⁷³ 《三國志·三少帝紀》，卷 4，頁 148。

⁷⁴ 武田幸男認為辰王成立於第三世紀初，是韓地諸國推舉出來以作為韓國與遼東公孫氏政權與曹魏交涉的代表，參見武田幸男編，《朝鮮史》，頁 46。三上次男則有二世紀末、三世紀初之說，參見氏著，《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頁 104。

⁷⁵ 如井上秀雄等譯，《東アジア民族史——正史東夷傳——》，頁 279。

王，屬辰王之諸國之王位可自行世代相續，辰王不得干預而以己意立各國之王。我的理由如下。

讀史料時，應留意其文本所在的脈絡。這段話是在〈韓傳〉的「辰韓弁韓條」中，⁷⁶而接於敘述完辰韓、弁韓二十四國之後。故其所述內容是關於此二十四國中的十二國屬辰王的相關史實。因此這段話的主詞與受詞皆是此十二國的首長。「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的「之」是十二國之首長。「世世相繼」的主詞亦是此十二國首長。「辰王不得自立為王」之「自立」的受詞則是非此十二國自身王者系譜內之人，而其「王」亦是十二國之王。

誤讀的關鍵之一在於這段話的「王」多被解為辰王。即學者不能認識到屬辰王的十二國首長是王。據〈韓傳〉，辰韓、弁韓二十四國中有十二國屬辰王，另十二國則不屬辰王。而此不屬韓王的十二國，〈韓傳〉曰：「十二國亦有王」。從這句話反推屬辰王的十二國也是有王。這些小國的君主為王，當是受中國冊封之故。這種小國之王的情形在漢魏時屢見，是冊封制度的一種。在《三國志·東夷傳》中就有數例。如不耐縣之首長不耐濊侯在正始高句麗戰時投降中國，故其後受封為不耐濊王。⁷⁷倭國的情形亦可參照。倭地諸國中除了像邪馬臺國女王是大國之王外，也有小國之王的伊都國王。⁷⁸

再者，舊說的三個主張本身並不協調，於理不通。此三主張是：一、辰王以馬韓人任之；二、辰王不得自立為王；三、世世相繼。第一個主張不論，辰王的王位既然是世襲相繼，何來不得「自立

⁷⁶ 也有學者認為是「弁辰」條(傳)，而與「辰韓」條(傳)區分。如井上秀雄，《東アジア民族史——正史東夷伝——》。但從「辰弁亦十二國」一句起，並不是專述弁韓。故這一部分宜籠統稱之為辰韓弁韓條。

⁷⁷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9。

⁷⁸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54。

為王」？一說認為，「不得自立為王」是因為辰王乃聯盟共主，所以辰王是藉聯盟機制所選舉產生，此即所謂「不得自立為王」。此說看似合理，尤其可支持「聯盟王國」，或所謂合議政治之說。⁷⁹只是，若陳壽在描述辰王是由選舉產生，則當是由幾個韓國中的大國君主中產生。然而，這種推舉制所產生的首長何以能「世世相繼」？

誤讀也不並始自現代，《後漢書》就開始了。成書於第七世紀中期的《晉書》改寫《三國志》之文就犯了錯誤。其文曰：

（辰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⁸⁰

這段記載中，辰王消失了，而《三國志·韓傳》所載的辰王被替換為辰韓。有沒有可能是今本《三國志》錯了？⁸¹然而有兩個理由否定這種誤植說。其一，B 史料中出現三次辰王，因此誤植說難以成立。其次，從 B 史料的整體來看，它在敘述二十四國中，十二國屬辰王，此外則是「十二國亦有王」。故陳壽的確是在論說「屬辰王」無疑。若不是因為《晉書》作者認識到晉代沒有辰王，則是無法讀懂這段紀錄中辰王的史實，故以辰韓置換辰王，自以為合理。同時期的《梁書》亦無辰王記載。成書於九世紀初年的《通典》更在辰韓條中，加入「（辰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之語，使《晉書》中的這一段說法更容易理解。⁸²

⁷⁹ 井上秀雄，《古代朝鮮》，頁 62。

⁸⁰ 《晉書》，卷 97，頁 2534。

⁸¹ 也有學者主張《三國志》此處是誤將辰韓記為辰王，即同意《晉書》的修改。但為符合自己的學說而改易史料，是違反史學方法的。主張辰韓說者如李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頁 241，李丙燾引用《梁書·新羅傳》記：「辰韓不得自立為王。」

⁸² 《通典》，卷 185，〈邊防典·東夷上〉，「辰韓」條，頁 4989。

這些史料都是傳抄《三國志》，再以己意解讀，史料價值低。以辰韓替代辰王，是嚴重的錯誤。《晉書》記載中只有「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一句是不同於《三國志》。而這句話出自《魏略》，如後所論。其他部分都是解讀《三國志》。辰韓受馬韓所制，或為史實，但說辰韓之國不能自立為王，則沒有根據，至少《三國志》中沒有這樣的論斷。

上引史料 B 有裴松之的注引《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⁸³《魏略》這段話的主詞是辰韓，不是辰王。所謂「流移之人」、「為馬韓所制」者是辰韓。學者以為這是裴注在解釋辰王，則為誤讀。反而《晉書》的引用《魏略》這段話來說明辰韓才是正確的。就《三國志》裴注的體例而言，其註解經常只是補充資料，並不是對本文的解釋。若史家根據這條史料，認為辰王集團是「流移之人」，無疑是錯誤解讀。

但「流移之人」說卻影響一些學者對於辰王的理解。如主張辰王是外來王。這是配合《三國志》說辰韓是後來的移民，也依據《晉書》的記載。⁸⁴基於這樣的信念，B 段史料才被解讀為辰王原是辰韓集團的領袖，但辰韓受制於馬韓，故辰韓領袖不得自立為辰王。但辰王原是辰韓領袖等史實都無法從《三國志》中推論出來，故在史學研究上都不能成立。⁸⁵

⁸³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53。

⁸⁴ 江上波夫認為辰王是從外部流移，也是因為相信《晉書》而解讀的結果，參見氏著，《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要說編》，頁 43-44。我也曾受這些學說影響而誤讀「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一句，認為辰王是辰韓移民者所建立的「外來王」型態的政權，及今思之，當屬錯誤而應訂正。參見甘懷真，〈東北亞古代的移民與王權發展——以樂浪郡成立為中心〉，頁 95。

⁸⁵ 參見李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頁 224-242。

依照本文的推論，辰王有可能是韓王的後代(見下文)，若說其前身是外來王亦無妨。只是幾百年下來也早已在地化，故沒有理由認為辰王在第三世紀中期有外來王的性格。而《魏略》的「流移之人」之說是在說明辰韓之人的狀態。《三國志·韓傳》記辰韓之條亦可推論辰韓是較晚移入朝鮮半島的人群。而此辰韓集團之人在朝鮮半島的發展為土著的馬韓集團「所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朝鮮半島南部的政局恐怕也不是辰韓為馬韓所制如此單純。而且馬韓、辰韓即使各自是一個政治聯盟集團，其內部也不是統一與協調的。總之，當時朝鮮半島南部是諸國並立，政治關係複雜。而韓地的整體政治發展是大國崛起，以及中國王權(包含邊郡政府)、高句麗王權的侵入。⁸⁶

這也讓我們聯想到 246、247 年的韓國戰爭，〈韓傳〉記中國方面「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這段史料在韓國史的研究中被認為是中國藉戰勝以占領韓國。這樣的推論是預設了韓諸國有統一的王權。然而，這項預設是待商榷的。當時的韓諸國自身是內部矛盾的政治單位。雖然我們不能反過來說此辰韓八國自願歸屬樂浪郡，但這些辰韓政權尋求中國的保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對抗的對象是馬韓集團，也可能是辰韓集團自身。在戰爭中的 246 年，有韓國中的那奚等數十國來向中國(邊郡)投降。⁸⁷那奚國不見於〈韓傳〉的諸國名單中，不詳其由來。我們可以推測它們或許是辰韓諸國為離開大國支配而願成為中國邊郡的屬國。或許正因為那奚成為中國邊郡下的屬國，所以不被記載於韓國名單。

基於這樣的史實背景，我們重新理解「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一段話要表達的事實。過去的學者都認

⁸⁶ 參見甘懷真，〈東北亞古代的移民與王權發展——以樂浪郡成立為中心〉。

⁸⁷ 《三國志·三少帝紀》，卷 4，頁 121。

為這段話是表達辰王如何受制於馬韓集團。但考慮中國冊封體制的原理，就不可能是如此。中國冊封辰王是在韓國戰爭結束後，中國以戰勝者之姿君臨韓地。且此次戰爭的導火線是爭奪辰韓的土地與人口。中國作為戰勝國，理應約束馬韓集團對於辰韓的支配。所以這段話的重點當是反映曹魏對於辰王政權的政策，即約束馬韓集團對於辰韓、弁韓諸國的支配。

無庸再贅言，中國的戰勝是有限度的或者是形式的。所以中國仍冊命馬韓集團的代表為韓地的王者。伴隨冊封，中國也任命了辰王政權下的政治領袖為侯、都尉、中郎將、邑君與佰長為中國式的官職，但韓國畢竟沒被編入邊郡的郡縣(國)制度下，保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性。辰王冊封的另一面是中國在韓地設置代表。此代表一方面象徵韓地的政治統一性，另一方面也約束馬韓集團不得破壞既有的政治秩序，如壓迫辰韓與弁韓。因此這段史料一方面說辰王所代表的馬韓人集團控制辰韓、弁韓之國，故其人常為這些國的統治集團。在辰王政權下辰韓、弁韓十二國之王依舊為馬韓人之現狀可以不用改變，但辰王必須尊重其所屬各國的政治自主性，如王位世襲。所謂「辰王不得自立為王」是說辰王所代表的馬韓集團不可以再介入辰韓諸國的內政，而另立馬韓之人為各國之王。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論，不屬於辰王的另十二國則是不屬於馬韓集團支配者。而在經歷了中韓戰爭後，此政治自主性由中國王權保障。故這十二國由中國方面冊封為王，而可能以縣國的性質成為中國的邊郡的屬國。

若再次比較《三國志·東夷傳》中的記述辰王與卑彌呼女王的記載，則可以清楚的知道陳壽如何認識辰王。

在〈倭人傳〉中，中國方面認識到有一人群為倭人，當時(第三世紀前期)約分三十國，其中大約有二十九國是屬於邪馬臺國之王治理。

邪馬臺國之王為女王，故〈倭人傳〉也以女王國稱之。這種以一國支配諸國的狀態同於辰王。對於中國而言，這是熟悉的封建制度。然而，〈倭人傳〉明確記載了女王對諸國的支配：

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⁸⁸

首先是女王在各國派有代表，所謂「大倭」或「大率」，以監督各國的活動。其次，在諸國中的重點國，如伊都國，更設有女王代表，如中國的刺史般監管在地政府。再者，女王亦控制整體倭國的外交，如在重要港口設檢查站等。這是否為歷史的實情，另當別論，至少看出中國方面認為女王政權與諸國之間有密切的政治關係。

相較之下，同一本書的同一傳記描寫辰王卻大不同，在〈韓傳〉中，隻字不提辰王與馬韓諸國之間有何政治關係。辰韓與弁韓的二十四國中，有十二國屬於辰王。但如前文所考證，所謂「屬辰王」，只是指其國君是出身馬韓人。且各國的首長的繼承也不受辰王干預。因此，所謂辰王「盡王三韓之地」，似乎是中國官方的想像。

那麼，何以目支國的政治領袖接受中國冊封為韓地的最高首長？雖然諸史料欠缺，無可確信的憑證，但我們也不宜認為這是中國方面的任意獨斷決定。辰王當是韓地在某方面的共同領袖，最可能的是這個區域的祭祀王。《三國志·東夷傳》為我們留下了所謂東夷王權中的祭祀王的描述，是十足珍貴的史料。以下遂以此文獻進行討論。

如夫餘王的紀錄，曰：「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

⁸⁸ 《三國志·倭人傳》，卷 30，頁 856。

咎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⁸⁹這類王者宣告自己具宗教能力，而其職能與正當性是維護農業生產。一旦農業生產出了問題，其責任由王者承擔。原因是王者的神力或魔法失效，故解決之道在換一位王者，甚至將原王者殺死。這是在人類學研究王權類型時所稱的「殺王」(the killing of the divine kings)。⁹⁰

當然，我們無法從夫餘王的祭祀王性格去推論辰王，只是可證明陳壽認識這一類王者的形態，且東夷王者可以是這種類型。陳壽關於馬韓的記載中，又有這樣的紀錄：「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關於「蘇塗」，有許多研究，不需節外生枝。我們可從這條史料推論馬韓政治社會的神權性格，所謂「信鬼神」。在各國的「天君」之上，有一更高位的祭祀王是極有可能的。而此王者的宗教聖地在月支國，此即後來的辰王。

〈韓傳〉的「馬韓條」給我們另一個線索。該史料記錄朝鮮王以外來王的身分在韓地稱王，曰：「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這段史料似乎失去脈絡，或有脫文，只是無從辯證。但這句「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卻透露重要事實。此外來的韓王政權作為「外來王」，具有神權性質。且當韓王政權結束後，韓王轉成被祭祀的對象，或許也有其祭司體系。其所在的月支國可能是一宗教聖地，而其祭祀所形成了一廣域的祭祀圈中心。若然，則辰王的前身

⁸⁹ 《三國志·東夷傳》，卷 30，頁 842。

⁹⁰ 經典著作是 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of Magic and Religion*. Frazer 對世界多處的王權現象進行人類學研究，探討其中的「殺王」制度。在原始社會中，王者的功能是維持人間與自然界的秩序。一旦王者肉體衰老後，就無法盡到此功能，於是秩序崩壞，而出現災荒導致饑饉。解決之道是將此衰老的王者殺死，迎接精力旺盛的新王者。

是宗教領袖，同時作為馬韓的政治領袖。

在 245 年前，辰王的前身是宗教領袖。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證據以知道此宗教領袖與各國的關係，但〈韓傳〉記載馬韓政治社會的宗教性格與組織，曰：「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⁹¹此辰王前身的宗教領袖或許即天君之首，而與各國的天君之間組成聯盟。在 247 年之後，由於中國王權藉由戰勝而進一步支配韓國。此時，若不是韓國方面推舉日支國的宗教領袖代表韓國向中國朝貢並受冊封，就是中國方面選擇了此宗教領袖為韓國的王者。

但在 245 年前後，韓國已出現大國崛起的現象。如百濟國。前引《三國史記》記載百濟與樂浪郡爭奪人口的戰役，即可證明此時的大國現象。百濟應該也是此次中韓戰爭主要戰爭發動者與戰敗國，故中國方面刻意避開這類強權國，而扶植日支國的宗教領袖為共主。

在正始韓國戰爭後，以馬韓為主的韓國統治集團在戰爭失敗後，他們推舉此位宗教領袖以諸韓國之首長的身分向中國朝貢並受冊封。也如學者所指出，辰王的主要職責是對中國的外交工作。另一可能是中國方面的主動任命。而後者可能性較大。因為我們看不出來馬韓諸國集團有共識去推共主。無論如何，中國朝廷是承認了辰王作為三韓王者的地位。對中國而言，辰王政權象徵中國對於韓地的支配權。這也從其下設置中國式的「邑君、都尉、伯長」可看出。這同時滿足中國方面的治天下的需求。

但究其實，在第三世紀的中期，此日支國的首長根本不是三韓地區的政治首長。當時如百濟等大國崛起，各自追求其建國之路。所謂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只不過是中國的觀點。即中國官方依其自身的王權學說而定義辰王為韓國的統一王權。但韓國自身卻不見得

⁹¹ 《三國志·韓傳》，卷 30，頁 852。

有此認識。這也從韓國方面自身的紀錄在記載新羅、百濟等國的興起時，完全不見辰王的踪跡亦可推知。在中國冊封辰王的同時，百濟與新羅也在崛起中。

六、辰王與辰國的關係——兼論倭王與倭國

《三國志·韓傳》的辰國史料，如下列史料 C：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

就 C 史料的字面而言，陳壽主張三韓中的辰韓是「古之辰國」，但辰國前加「古之」，因為陳壽認為此「辰國」已不存在。若 C 段史料無衍誤，則陳壽是主張古之辰國與今之辰王無關。

辰國的記載出於《漢書》。《漢書·朝鮮傳》的記載如下：

(朝鮮衛滿)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弗通。⁹²

而這段記載當承襲自《史記·朝鮮傳》，《史記》之文如下：

(朝鮮衛滿)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⁹³

其中的「真番旁眾國」在《漢書》中被寫成「真番辰國」。學者認為這是《漢書》傳抄《史記》時，誤將「眾國」寫成「辰國」。⁹⁴這種判定是有道理的。真番是《史記》中的一個明確的地理概念，可能是一個政權。司馬貞《史記索隱》稱之為「東夷小國」，⁹⁵而一般推論

⁹² 《漢書·朝鮮傳》，卷 95，頁 3864。

⁹³ 《史記·朝鮮傳》，卷 115，頁 2986。

⁹⁴ 參見三品彰英，〈史實と考証——魏志東夷傳の辰国と辰王——〉。

⁹⁵ 《史記·朝鮮傳》，卷 115，頁 2985。

真番在朝鮮南方。《史記》是說衛氏朝鮮阻止其南邊的真番附近之國向中國天子朝貢。《漢書》記同一件事，卻記成「真番辰國」。目前的標點本寫成「真番、辰國」，此當是受《三國志》以來單獨出現辰國紀錄的影響。若《漢書》與《史記》是在記同一件事，《漢書》將《史記》中籠統記載的「真番旁眾國」改成「真番、辰國」是於理不通的。除非班固有其他史料來源。

問題不只出在辰國，也出在真番。在《史記》中，並沒有記真番國不能通於中國天子。其不通者，是真番旁的眾國。可是依《漢書》的記法，則真番(國)也不通於漢天子。但《史記·朝鮮傳》明言：「(朝鮮)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⁹⁶同一段的《史記》之文又記衛氏朝鮮政權阻止「真番旁眾國」上書見漢天子。據此推論，《史記》認為真番是服屬於衛氏朝鮮。無法交通漢天子的不是真番，而是真番旁的諸國。可是在現行的《漢書》中，真番國也成為無法上書天子的一國。此非《史記》之意甚明。《漢書》沒有理由與證據去改變《史記》的紀錄。真番與辰國並列是不通的。

這是一個顯而易現的矛盾，故司馬光《資治通鑑》在記載這段史實時略去「真番旁」，而只記「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⁹⁷但這又是相信《漢書》而捨《史記》的結果，於史學方法亦不通。總之，若班固真的手上握有新史料，可以證明司馬遷所說的「旁眾國」是具體的辰國，也沒有理由將真番國視為不通中國天子的一國。至少這是對於《史記》的錯誤解讀。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釋是這一句話傳抄錯誤。即《漢書》將「旁眾國」抄成「辰國」。

至於為什麼有此傳抄之誤，只能是個謎了。但因為《漢書》的辰

⁹⁶ 《史記·朝鮮傳》，卷 115，頁 2986。

⁹⁷ 《資治通鑑·漢紀》，卷 21，元封二年，頁 684。

國紀錄，且《漢書》具有經典的地位，故後世之人相信朝鮮半島南部有一辰國存在。當代學者中，相信有辰國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有學者藉此推論辰國是自中國移入的所謂古國，而可以推其起源至西元前二十一世紀。但這匪夷所思。⁹⁸這類研究都是先立基於《三國志》、《後漢書》的「古之辰國」說之上，再以「辰」為關鍵字，去先秦史籍中找線索。但無論作何種詳密的歷史語言學的考證，都是基於學者先相信(西)漢代有辰國存在的事實。一旦我們根本無法確證漢代有辰國的存在，任何推論古辰國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更何況先秦史籍中沒有一條辰國的紀錄，⁹⁹學者只好檢索史籍中的辰字以證成辰國的存在，但國名在歷史上的存在，豈能用推論法。

這些古辰國考證難以成立的另一理由是漢字使用的考量。學者花費力氣對辰字作考證，自是預設辰國統治者是使用漢字的人群，且帶著辰字的國號來到朝鮮半島。可惜這個預設不能成立。朝鮮半島開始正式有漢字使用須待西元前二世紀末樂浪等郡的設立，由於

⁹⁸ 如李德山，〈辰國新考〉。

⁹⁹ 蒙文通曾經考證辰國，他推論辰字與商字通，故辰國是商人所建之國。再推論此商人是箕子所領之民，故結論是辰國乃箕子所建的古國。參見氏著，《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頁 99。這種推論牽強附會，濫用歷史語言之方法，難以成立。若要推論朝鮮半島南部的人群與商人有關聯，依目前對於古代東亞人群移動的研究來看，的確是有可能，但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商人曾在朝鮮半島南部建立過一個名為辰國的政權。人群移動的可能與特定政權的成立是兩回事，不可故意混為一談。蒙文通的箕子國號是辰之說頗有影響，其後從其說者如羅繼祖，〈辰國三韓考〉。近年來，學者為發揮目前流行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學說，證明中國及相鄰域外之地的古國如何從中國古文化發展而來，辰國更被拿來作例證，如李德山，〈辰國新考〉。該文宣稱辰國是在西元前二十一世紀即存在於朝鮮半島南部的古國。他遵循蒙文通的考證法，只能作辰字的辯解，依然沒有任何一條直接證據。又如劉子敏，〈關於古「辰國」與「三韓」的探討〉一文，也論證辰國是箕子的古朝鮮國。另亦參見村山正雄，〈「辰國」臆斷〉。

中國政府的運作，才開始有漢字使用。且使用者恐怕都是中國系的官員，而在朝鮮半島南部所看到的漢字文物，都要到第五世紀以後了。¹⁰⁰既然在《漢書》所記載辰國出現的時間點上，朝鮮半島的政治界根本不使用漢字，當地人不可能有漢字的概念，自然就不會有漢字的「辰」的國名。即使當時真的有一國被中國官方稱為辰國，此辰國也不可能是自古以來該國的自稱，也不可能是商人一族的自稱而帶入朝鮮半島。

辰有無可能是當地語言的譯音漢字？這種譯音推論法可用於辰王，而不能用於「古之辰國」。有學者認為辰是韓語譯音之漢字，表「大」之義，故辰王是表大王之義。¹⁰¹的確有可能月支國之辰王在韓國被稱為「大王」，而其音為「辰」。而曹魏朝廷在冊封此大王時，依據當地的發音，附會了「古之辰國」之說，故稱之為辰王。但這種歷史的細微處，也只供遙想。

在曹魏及之前的後漢，不存在辰國當為陳壽與范曄所共知的史實。但他們都基於對經典(此指《漢書》)的信任，而執著於「古之辰國」的存在。只是陳壽沒有論及古之辰王與今之辰王之間的關聯性，反而是時代在後的范曄明確建立二者的關係。《後漢書·韓傳》曰：

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¹⁰²

西漢前期存在的辰國為朝鮮王準所滅，取而代之的是韓王政權。其後，韓王政權被消滅，在地的馬韓人集團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權機構，而其首長稱為辰王。該文的「復自立」之說，沒有提到辰國，這

¹⁰⁰ 綜合的說明參看李成市，〈古代朝鮮の文字文化——見えてきた文字の架け橋〉。

¹⁰¹ 李丙燾，《韓國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頁 226-227。

¹⁰² 《後漢書·韓傳》，卷 85，頁 2820。

是因為辰國的不存在。但范曄認為馬韓人集團恢復了原辰國所代表的在地政權，其王者之名也承襲自辰國的王者，故曰辰王。

范曄的這種記載很含混，不好直接判斷是否為史實。若這條史料包含若干史實，則是在地馬韓人集團消滅了外來韓王集團並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而此政權的首長或許就是作為祭祀王的月支國的君主。此月支國君主其後為曹魏政權冊封為辰王。至於馬韓人政權與古辰國的關聯性，當是基於經典的信仰而想當然耳之說。范曄所建構的歷史或許不是史實，但范曄的信念卻提供了另一個史實，即辰王之稱號來自於古之辰國。我們可以據此推論曹魏冊封韓地的政治領袖為辰王是因為其支配之地為「古之辰國」。

辰王之名的由來是從「古之辰國」而來，此應可確認。在《漢書》刊行之後至《三國志》成書之時，中國官方相信朝鮮半島南部曾經有一辰國存在。¹⁰³曹魏朝廷即以此古地名冊封辰王。曹魏開始新的屬國政策，即冊封域外的大國首長，且以經典中的古地名為其封號。倭王的冊封是相同的例證，即中國冊封一位倭地之王者。

然而，《三國志·東夷傳》稱朝鮮半島南部之地為韓，是(諸)韓國。中國官方冊封倭地之首長為倭王，但沒有冊封韓地之首長為韓王。推測其原因，中國官方是以儒家經典中的世界像作為冊封域外首長的依據，而韓作為經典中的地名，是指先秦的古國之韓國。故中國無法以韓之名命名朝鮮半島的政治單位。

又，《三國志》與《後漢書》都顯示當時辰王所治非辰國。故辰

¹⁰³ 《魏略》有這樣的記載：「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參見《三國志·東夷傳》，卷30，頁851。若依字面解，則在西元前第一世紀時，辰國仍存在。若然，則與本條《後漢書》所記韓王滅掉辰國記載不符。筆者推論，《魏略》使用辰國一詞，只是籠統的指朝鮮半島的南部。

王非辰國之王。一如倭王不是倭國之王。後者因為史書中記為倭國之詞，雖是指倭人之諸國，但的確會混淆，而前者辰王之例則非常清楚，因為當時斷然無辰國。這樣的看法得出另一個結論，即辰王、倭王等名號是中國的冊封體制的名號，來自中國經典中的世界像，而非在地客觀的秩序與知識的反映。辰王一稱，完全是中國方面基於自己的認識所定的名稱，並不是先有了一個客觀存在的辰國。倭王之例亦同，以下略作討論。

在《三國志·倭人傳》中，陳壽使用了倭人、倭種與倭國等詞彙。倭人與倭種是同樣的概念，指稱一種人群。陳群在〈倭人傳〉中對於倭人的文化型態有所描述，至於對錯，另當別論。而倭國在《三國志》中是指倭人之諸國，即複數的倭國。一如韓國是指複數的韓國。在〈倭人傳〉中，倭為一人種，而有諸國。〈倭人傳〉記載了這些倭國的名稱，如奴國、伊都國等，同時記載了這些倭人之諸國中的一部分成立了政治聯盟。該文獻稱此政治聯盟為「女王國」。女王國的共主之國為邪馬臺國。¹⁰⁴但陳壽稱此倭人之國的政治聯盟為女王國，不是邪馬臺國，其證據是〈倭人傳〉曰：「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¹⁰⁵無論邪馬臺國位何處，依〈倭人傳〉定位，肯定離海甚遠。故「女王國東渡」云者，是指以邪馬臺國(之卑彌呼女王)為首長的「女王國」的向東渡航。由此可證，此約三十國的倭人之國的聯盟，中國稱之為「女王國」。更重要的是，此女王國在〈倭人傳〉沒有被稱之為倭國。換言之，倭國是倭人之諸國，並不用來指稱女王國。至少就〈倭人傳〉而言，並沒有邪馬臺國(女)王所治為「一個」倭國的說法。在〈倭人傳〉中，明確記載倭人有諸國，而此女王所支

¹⁰⁴ 〈倭人傳〉記為邪馬臺國。但通論皆論為是邪馬臺國，就略去考證。

¹⁰⁵ 《三國志·倭人傳》，卷 30，頁 856。

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 239 年，曹魏冊封邪馬臺國的卑彌呼女王為親魏倭王。卑彌呼女王所受的中國冊封的王號是「倭王」。學者普遍認為倭王即倭國之王。¹⁰⁶其證據是〈倭人傳〉中記魏正始元年曹魏官方遣官員「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¹⁰⁷但此倭國是指倭人之諸國。若我們要說倭王所治為倭國亦不為過，但此倭國是與倭人、倭種同義，並不指作為一國的倭國。中國方面任命卑彌呼為倭王，是要其支配倭國。

《三國志·齊王芳紀》記載 239 年的冊封事件為「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這應該是中國官方的檔案紀錄，由此可知「倭國女王」是正式的稱呼法。¹⁰⁸且可推論倭(女)王亦是倭國(女)王。然而，此「倭國」仍是倭人之諸國。

〈倭人傳〉記曹魏朝廷冊封卑彌呼女王的詔書，有「今以汝為親魏倭王，……綬撫種人」之語。¹⁰⁹所謂「種人」，即該傳所謂的「倭種」，亦即倭人。推而論之，此「親魏倭王」是其「種人」之王，即倭人之王。

筆者所要爭辯的，並不是倭國一詞及其概念是否存在，而是強調它是一個中國冊封體制下的概念，不是在地的概念。簡單地說，在第三世紀，它是一個中國的概念，而不是日本的概念。倭、倭人、倭種、倭國與倭王皆是他稱，是來自中國經典中的世界像或冊封體制。反之，在地日本並沒有作為一國的倭國的概念與名稱。我

106 女王國與倭國的關係，參見西嶋定生，《邪馬臺國と倭国——古代日本と東アジア》，頁 2-12 的重要討論；亦參見井上秀雄，《倭・倭人・倭国——東アジア古代史再検討》，頁 160-224。

107 《三國志·倭人傳》，卷 30，頁 857。

108 倭彌呼即〈倭人傳〉之卑彌呼，應無疑。

109 《三國志·倭人傳》，卷 30，頁 857。

們從〈倭人傳〉看到的是諸國並立，其中有約三十國屬於女王國，而也有不屬於女王國者。再對照辰王之例就更明顯。辰王因為冊封體制而被中國朝廷視為韓地(三韓)的首長。若我們要說其支配區域為一國，亦不為過，只是無辰國之說。且從《三國志·韓傳》來看，辰王支配的對象是多元、複數的(諸)韓國。又韓諸國中也有實際上不隸屬於辰王者。換言之，將辰王所支配領域視為一國是一種中國的概念，而不是在地的概念。在第三世紀後半，朝鮮半島南部的政治實態是諸國並立，其中的大國崛起，且互相攻伐，而沒有作為一國的辰國或韓國的概念。

辰王與倭王的冊封可以看出一種新型態的冊封體制，也反映新的屬國制度，至少就東夷政策而言。曹魏所冊封的王者不再是郡縣體制中的「國」的首長，而是任命一「種」蠻夷的首長以為其「種人」的王者。以倭王之例而言，倭(女)王受中國皇帝冊封，故是皇帝之臣。其國是中國的屬國無疑。倭王之下的高級高員亦受中國皇帝冊封而有中國式的官職，如率善校尉、率善中郎將。這也是屬國之證。另一方面，此屬國不屬於郡縣或郡國的體系中，雖然仍受郡政府(如帶方郡)的管轄。且中國也承認此女王國可以有自己的官屬，亦即有自己的行政系統。就這一點而言，此女王國是自主之國。

七、結語

本文藉由三世紀中期左右朝鮮半島南部的辰王之例，探究漢魏之際東亞世界的冊封體制的變遷。變化的動力可分析為二，分為中國內部與外部。中國內部是儒教國家體制的成立。儒家經說成為政治最高指導原則，儒家經典中的世界像轉換成政治制度。另一個原因是漢代郡國制的變化，但這一點本文沒有申論，希望將來有機會

再作思考。外部動力則是所謂蠻夷地區的大國崛起。本文僅限於討論所謂東夷，即當時中國的東北邊境外，即今天的中國東北、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至於北疆面對騎馬遊牧民族，西邊面對內陸亞洲各族群，以及所謂西南夷，則需專文論及，其事例不一定能包括在本文的東夷討論中。

在漢代，中國域外與邊境的所謂蠻夷是小型的政治單位，被編入中國的郡國體制中。這些蠻夷起初是受邊郡下的縣的支配，其後勢力漸大，而中國將此類的縣轉化為縣國，並以當地蠻夷首領為首長，如任命為縣侯。漢末，這些縣若非取得更大的自立性，則被其他蠻夷大國所支配。雖然當時中國王權衰微，但邊郡政府作為自立的政體，卻加強向域外殖民，遼東公孫氏政權是著例。這類中國邊郡也加強控制蠻夷小國。另一方面是蠻夷小國依違於這些大國(包含中國邊郡)之間。於是我們看到二世紀末至三世紀的一大現象是大國崛起，如夫餘與高句麗。無論是通過和平手段或戰爭，幾個大國整合了廣域的政治單位。由於大國成立，中國朝廷無法再將它們編入郡之下的縣級單位。

因此，新的冊封體制成立。239年曹魏冊封倭王是一個起點。中國朝廷以儒家經典世界像中的種(族)概念為單位任命蠻夷統治者。如倭王統治倭種、倭人。其後的辰王也是。辰王被任命為韓人或韓種的最高首長。這類蠻夷王者受中國天子冊封，制度上為中國天子之臣。其國亦是中國的屬國，但不再以中國的縣級單位名義而隸屬於邊郡。這個變化過程可被稱之為從郡縣屬國到自主的屬國。「自主」與「屬國」是理解東亞冊封體制的二個關鍵字。¹¹⁰這種體制當從曹魏

110 參見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頁367-383。這是約1600年後的中韓關係史，可供對照。

開始開展。第三世紀後，東北亞的建國運動致使強大王權興起，原本屬於中國邊郡又具某種封建自主性的政治單位多被併入這類王權支配中，如朝鮮半島的「三國」。因此原本的「漢國家—郡—蠻夷之縣國」的體制轉換為我們所知道的冊封體制。東亞的政治秩序也正式出現「國際」關係，即中國為一國，而外國亦為一國。中國如唐國，而外國如日本。但第三世紀只是這一串變化的開始，其後當有許多有意義的變化。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例，中國的地方行政制度也發生很大變化，如將軍號、都督諸州軍事等。而這些中國域外君長也被冊封將軍號與都督諸州軍事等。這些變化的歷程也需另文研究或有待方家。

本文也藉由辰王的考證，探究了古代韓國王權的歷史。由於史料有關，推測論斷在所難免。但筆者相信，本文重新解讀《三國志·韓傳》所提出的若干答案，對於學者日後運用該史料以推論相關歷史時，或可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我們應懷疑古代有辰國存在。朝鮮半島南部在三世紀中期以前，從來沒有形成過統一的政治體。而辰王當是三世紀中期的正始韓國戰爭之後為中國(曹魏)所冊封，以代表諸韓國。辰王的王者形象是來自於中國的冊封體制，就該體制而言，它是真實存在，卻又是在地政治社會中的虛像。在辰王出現的同時，韓國正在經歷大國崛起，如其後的百濟、新羅國。由於辰王的存在是決定於冊封體制，而不是在地的政治社會，故我們可以推測，當百濟崛起，百濟國也成立其勢力範圍內，中國的冊封關係終止，辰王政權也隨之消失。

最後筆者想藉親魏倭王之例，申論冊封體制與東北亞王權運動的關聯性。中國在冊封邪馬臺國的首長為倭(女)王時，是任命該首長為倭人或倭諸國的首長。但就在地的政治現狀而言，倭人並未出現一國，更無一國的意識。但在第三世紀後期，大和王權在今天的京

都、奈良崛起，其統治者巧妙的運用了這個外來、他稱的倭概念，而自稱倭王，藉此宣告其對倭人之地的日本列島的支配權。五世紀來向中國朝貢並受冊封的「倭五王」即是例證。此課題仍有繼續探究的必要。

(本文於 2011 年 4 月 15 日收稿；2011 年 8 月 12 日通過刊登)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十三經注疏本。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2。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爾雅》，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十三經注疏本。
《翰苑》，臺北，藝文出版社，1971。

二、近人論著

- 卜憲群，〈秦漢之際國家結構的演變——兼談張家山漢簡中漢與諸侯王國的關係〉，《秦文化論叢》，12(西安，2005)，285-323。
三上之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
三品彰英，〈史実と考証——魏志東夷傳の辰国と辰王——〉，《史学雑誌》，55：1(東京，1944)，頁 70-88。
大槻健等譯，《韓国の歴史》，東京：明石書店，2003。

- 井上秀雄，〈『三国志』の東夷王者觀〉，《東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31(仙台，1981)，頁 191-248。
- 井上秀雄，《古代朝鮮》，東京：講談社，2004。
- 井上秀雄，《倭・倭人・倭国——東アジア古代史再検討》，東京：人文書院，1991。
- 井上秀雄等譯註，《東アジア民族史——正史東夷伝——》，東京：平凡社，1974。
- 井上幹夫，〈『魏志』東夷伝にみる辰王について〉，竹内理三博士古稀記念会編，《続律令国家と貴族社会》，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頁 201-223。
- 末松保和，〈真番郡治考〉，收入氏著，《末松保和朝鮮史著作集》，第 3 冊，《高句麗與朝鮮古代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2-19。
- 末松保和，《新羅史の諸問題》，東京：東洋文庫，1954。
- 平勢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華へ——殷周・春秋戰國》，東京：講談社，2005。
- 白鳥庫吉，〈漢の朝鮮四郡疆域考〉，《東洋學報》，2：2(東京，1912.5)，頁 125-181。
- 甘懷真，〈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9(北京，2010.6)，頁 333-349。
- 甘懷真，〈制禮觀念的探析〉，《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頁 81-118。
- 甘懷真，〈東アジア世界の冊封体制と儒教〉，收入吾妻重二主編，《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東京：勉成書店，2005，頁 87-108。
- 甘懷真，〈東北亞古代的移民與王權發展——以樂浪郡成立為中心〉，《成大歷史學報》，36(臺南，2009.6)，77-99。

- 甘懷真，〈東亞古代冊封體制中的將軍號〉，收入徐興慶主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25-70。
- 吉井秀夫，《古代朝鮮墳墓にみる国家形成》，京都：京都大學出版會，2010。
- 江上波夫，《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要説編》，東京：山川出版社，1965。
- 池内宏，〈公孫氏の帶方郡設置と曹魏楽浪・帶方二郡〉，《滿鮮史研究・上世篇》，東京：吉川宏文館，1979，頁237-250。
- 池内宏，〈曹魏の東方経略〉，《滿鮮史研究・上世篇》，東京：吉川宏文館，1979，頁251-294。
- 西嶋定生，〈親魏倭王冊封に至る東アジアの情勢——公孫氏政權の興亡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頁469-512。
- 西嶋定生，《邪馬臺国と倭国——古代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
- 村山正雄，〈「辰國」臆断〉，《朝鮮學報》，81(奈良，1976)，頁397-416。
- 李丙燾，《韓国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諸問題》，東京：學生社，1979。
- 李成市，〈古代朝鮮の文字文化——見えてきた文字の架け橋〉，收入平川南編，《古代日本・文字のきた道——古代中国・朝鮮から列島へ》，東京：大修館，2005，頁32-65。
- 李成市，〈古朝鮮から三国へ〉，收入武田幸男編，《朝鮮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5，頁13-48。
- 李基白著、武田幸男譯，《韓国史新論》，東京：學生社，1979。

- 李德山，〈辰國新考〉，《學習與探索》，146(哈爾濱，2003.3)，頁 124-126。
- 汪啟明，〈東夷非夷證詁〉，《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版)》，191(成都，2007.7)，頁 11-15。
- 那珂通世，〈三韓考〉，《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圖書，1915，頁 126-135。
- 和田清，〈魏の東方經略と扶餘城の問題〉，《東亞史研究・滿州篇》，東京：東洋文庫，1955，頁 22-54。
- 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47-52。
- 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關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
- 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上)〉，《朝鮮文化研究》2(東京，1995)，頁 13-36。
- 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下)〉，《朝鮮文化研究》3(東京，1996)，頁 1-24。
- 武田幸男編，《朝鮮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5。
- 金思燁譯，《完訳三国史記》，東京：明石書店，1997。
- 阿部幸信，〈漢初「郡国制」再考〉，《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9(東京，2008)，頁 48-62。
- 金榮來著，中山清隆譯，〈百濟南方境域の変遷〉，收入山田裕、森田悌編，《論争日本古代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1，頁 303-349。
- 胡小鵬、安梅梅，〈近年來秦漢屬國制度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0(北京，2007)，頁 11-19。

- 栗原朋信，《上古日本對外關係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
- 逢振鎬，〈十年來東夷文化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10(北京，1991)，頁 1-8。
- 逢振鎬，《東夷文化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
- 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明圈的探索——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3(北京，2004)，頁 27-40。
- 陳蘇鎮，〈漢初侯國隸屬關係考〉，《文史》，70(上海，2005)，頁 5-10。
- 鳥越憲三郎，《中国正史倭人・倭国全釈》，東京：中央公論社，2004。
- 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
-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上海：龍門聯臺書局，1958。
- 劉子敏，〈關於古「辰國」與「三韓」的探討〉，《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2003)，頁 131-138。
- 羅繼祖，〈辰國三韓考〉，《北方文物》，41(哈爾濱，1995.1)，頁 73-75、22。
-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三版。
- Frazer, J. G.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of Magic and Religion*.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5-1930.

The Kingship of Chen and the Investiture System in Third Century East Asia

Huai-chen K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investiture system was the main ba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re-modern East Asi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origins and changes of the investiture system by studying the case of kingship of Chen, which ruled the southern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third century, recorded in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First, I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biographies of foreigners in the official histories. Second, I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vassals of the Han Dynasty outside of Han territory in northeast Asia,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reexamining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ird, I summarize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n the third century, showing how the Han's vassals under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ecame so-called "autonomous vassals." Finally, I review the texts of the "Biographies of Eastern Foreigners" in the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 illuminate what is known about King Chen, further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ypes of monarchy in ancient East Asia.

Keywords: King Chen, Korea, investiture system, East Asian kingship,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